

分类号 _____
U D C _____

学校代码 10590
密级 _____
公开 _____

深圳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一带一路”战略之安全问题研究

学位申请人姓名 _____ 法帝

专业名称 _____ 国际关系

学院（系、所） _____ 社会科学学院

指导教师 _____ 徐建华 副教授

深圳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一带一路”战略之安全问题研究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的作品或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深圳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研究生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属深圳大学。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他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深圳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涉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论文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摘要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是共同发展战略的理念和倡议，不是另起炉灶的共同发展战略，是依靠包括中国与有关65个沿线国家既有的双多边共同发展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是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

“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共同发展战略决策，是统筹沿线国家内外的长线工程，发展动力与制约因素并存。由于“一带一路”建设可能导致更高层级的“国家风险”，因而具有安全属性，所面临的风险也将是各种安全风险的高端聚合，具有空间维度上的系统联动性、时间维度上的战略长期性、性质方面的应对局限性。因此，“一带一路”共同发展战略建设之初，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沿线国家必须加强客观正确分析与预判形式的能力，统筹好“一带一路”进程中的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将发展与安全的相互制约关系转化为相互促进关系，达致“有利于安全的发展，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的良性互动态势，确保“一带一路”趋利避害。

与此同时，安全发展是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性问题，“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着恐怖主义、宗教冲突、民族冲突、大国干涉等“安全（传统和非传统）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方面共同面临着安全发展的挑战，另一方面存在着共同发展的安全共识与利益。安全共识与利益可以归结为“三共五通”，“三共”是指共商、共建、共享，“五通”是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通过对“三共五通”的安全利益和共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共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亚洲以及新亚洲安全观的应对策略，从而实现亚洲安全共同体的目标，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安全基础。

关键词：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安全挑战、三共五通

Abstract

“One Belt One Road” abbreviated (OBOR), refers to abbreviation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One Belt One Road” is an idea and initiative of comm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t is not about an overall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it depends already existing two and multi-sid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related 65 countries included China. With the help of existing and effective regional cooperation platform, it aims at borrow the ancient symbol “Silk Road”, carry the flag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ctively develop an economic partnership with countries of OBOR and together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interest, responsibility and destiny featuring mutual political trust, economical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inclusiveness. This is the road of mutual respect and trust, win-win cooperation and mutual reference of civi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secure development is the key point of “One Belt One Road, it is confronted with terrorism, religious conflict, ethnic conflict, western intervention etc. security (traditional and untraditional) challenges. OBOR countries are one side together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secure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side have opportunity of security consensus and benefit. In this paper the security consensus and benefit are analysed with the “common built” principle of OBOR which is summed in “three common” that refers to “common discuss, common build, common use” and the “five main cooperation areas” of OBOR which are summed in “five connection” which refers to “policy connection, infrastructure connection, trade connection, finance connection, people connection”. On the basis of deep analysis of security consensus and benefit of “three together” and “five main cooperation areas”, it is proposed to rebuilt together “Asia community of interest, responsibility and destiny” and make together overcome strategy of the new Asia security concept, and consequently, in order to arrive Asia community of security aim and build security basi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BOR strategy.

Key words: Silk Road, One Belt One Road, Security Challenge, 3 Principles 5 Contents

目 录

摘要	I
Abstract	II
绪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研究意义	1
三、研究综述	3
四、研究方法	6
第一章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安全挑战	7
第一节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恐怖主义挑战	7
第二节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宗教冲突挑战	9
第三节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民族冲突挑战	10
第四节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大国干预的挑战	11
第二章 “一带一路”战略与地区安全	15
第一节 “三共”原则与地区安全	15
一、“共商”原则与地区安全	16
二、“共建”原则与地区安全	18
三、“共享”原则与地区安全	20
第二节 “五通”与地区安全	21
一、“政策沟通”与地区安全政策	21
二、“设施联通”与地区基础设施安全	23
三、“贸易畅通”与地区经济安全	25
四、“资金融通”与地区金融安全	26
五、“民心相通”与地区文明安全	29
第三章 “一带一路”战略安全问题的应对	32
第一节 “共建亚洲”共识与“一带一路”战略	32
第二节 建设“三个共同体”与“一带一路”战略	34
一、建设利益共同体与“一带一路”战略	35

二、建设责任共同体与“一带一路”战略 -----	37
三、建设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战略 -----	39
第三节 构建亚洲版的新安全合作 -----	40
一、“亚洲版”的安全基本内涵-----	40
二、亚洲新安全合作-----	41
第四节 “五通”应对“一带一路”四大挑战-----	42
一、“五通”应对恐怖主义-----	42
二、“五通”应对宗教冲突-----	43
三、“五通”应对民族冲突-----	44
四、“五通”应对大国干预-----	45
结 语 -----	48
附 录 -----	49
参考文献 -----	52
致 谢 -----	55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秋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在出访期间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共同发展战略倡议，获得国际舆论高度关注。“新丝路”是典型的交通经济带。全面把握、综合比选和高度概括了古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交通、城市、的地缘政治状况、产业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一带”和“一路”都是以古丝路沿线已经形成或即将形成的运输通道为基础。

通过发展“五通”，即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形成从中国到中亚、西亚，从西亚到非洲及欧洲的区域大合作。包括中国在内诸亚洲国家都处在发展阶段，都面临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拥有加快自身发展、实现文明复兴的同样的梦想和信念。而对于“一带一路”规模这么大，影响力那么强的一个全球性的新战略来说，首先需要完全特别有安全的环境。国际安全格局的情况越来越呈现更危险更没有安全的趋势，导致国际投资环境恶化。国际恐怖组织的数量越来越多，国际不安全环境一天比一天增加。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安全感，国际投资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等等。延续六年的叙利亚内战再次证明了“国际安全的重要性”。所有的这些原因强迫我们重新深刻地考虑国际安全问题。所以说，在这样没有国际安全环境条件下，我们梦想和讨论对人类和平有好处的大战略就只是白日做梦。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战略之安全问题这一研究课题，是21世纪中国和“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在有真实安全国际环境里发展的公共所需，也是东方文明发展的新形势的需要。通过对比“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的现状及未来顺利稳定发展来为“一带一路”的发展献计献策，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因此，根据导师的建议及本人兴趣，最终确定安全方面研究“一带一路”。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势不可挡，加强对“一带一路”与安全问题的研究具一定的学术价值。目前“一带一路”与安全问题的比较研究相对薄弱，大部分的研究都是

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和研究“一带一路”。而随着“一带一路”的地位和作用的日益凸显，对“一带一路”安全研究日益重视，但对“一带一路”与安全进行比较研究的研究成果还很少见。对“一带一路”的介绍研究相对较多，而对“一带一路”与安全进行对比分析则屈指可数。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关于这一方面的理论研究。本文尝试对“一带一路”战略与安全问题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一带一路”概念的综述，归纳“一带一路”和古丝路的异同，概纳“一带一路”战略与安全的特点，分析深层原因，以求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之策，从而为“一带一路”战略与安全的学术研究尽绵薄之力。

（二）实践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理念是加强同新丝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巩固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合作基础，其关键是管理好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系，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发挥好有关国家间的积极作用，巩固互联互通，优势互补，鼓励互利共赢，打造好同新丝路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一带”可以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合作，逐步形成连接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沿线国家人员往来和经济发展提供便利；“一路”不仅可以巩固和发展沿海国家的经贸关系，同时可以逐步辐射到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等地区。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涉及经济、政治领域，还涉及到宗教、教育、文化等领域。“一带一路”战略是不同领域的共同发展战略，新丝路具有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启迪我们在“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中必须更好地发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作用。因此，在共建“一带一路”新战略背景下，对“一带一路”的安全问题和顺利发展进行比较研究，以便使我们了解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新外交发展进程。

（三）创新点

1、创新研究视角。从新战略构想效用切入，围绕怎样最大程度发挥“一路一带”沿线国家新外交的推动作用和共同安全发展战略，将“一路一带”战略融入有关国家的外交中，用“一带一路”战略促进相关国家外交的发展。并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比较研究来得出中国外交的对策。

2、深化研究内容。围绕“一带一路”战略的作用这一核心问题，根据现有论著，

深度挖掘了相关内容。在构建体系的过程中，本文亦作了一些深入探讨，尽量体现内容体系的科学性和相对完整性，用以区别现有论著成果的表现形式及内容范围。

3、应用性较强。当前国际关系的形势是有关国家“一带一路”共同战略发展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本文的有关论述、内容体系和建议，努力作了一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讨，密切关注和服务当前的形势和工作。

4、融入笔者的个体行动体验和个人思考。笔者在中国攻读硕士三年来，亲身访问、游历“一带一路”主要沿线国家，足迹遍及东南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南亚（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等）、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和西亚（伊朗、土耳其等），通过采访的方式，与当地大学、媒体集团、政府部门的学者教授、记者专家、官员进行关于“一带一路”的探讨；通过实地考察的方式，与当地民众交流，考察他们对“新丝绸之路”的感知和期待。另外，2016年笔者在北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国际关系部进行实习，做土耳其媒体和智库关于“一带一路”的资料的搜寻、分析与研究工作，受益匪浅。

三、研究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1、国内关于“一带一路”战略概念界定

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由此，“一带一路”战略一词开始在中国社会流行，并在之后不久扩展到了全世界，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提出两个符合亚欧大陆经济整合的共同发展战略，通过整合东南亚与东北亚经济，向西延伸并最终通往欧洲，从而整合整个亚欧大陆的经济。“一带”战略从陆上联通亚欧两个大陆和“一路”战略从海上联通亚非欧三个大陆形成一个陆上与海上的闭环。

2、国内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研究

国内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非常兴盛，建立了许多研究院、研究中心、研究网页、智库中心等等。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在国内首创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China Academy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简称CAOBORS）。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在“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别研究、旅游、经济、文化、贸易具备长期研究的基础，目前主持和参与国家发改委

《数字“一带一路”》、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研究》、北京市社科规划办《大数据背景下“一带一路”科学知识图谱绘制与应用》等研究。华中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建立于2015年7月，是由来自华中地区、上海地区从事国际关系、国际经济、区域经济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科学的研究机构。

“一带一路”战略研究网是应社会发展需求，由相关业内相关人员成立的一个专门的研究平台。“一带一路”战略研究网成立于2015年，依托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为基础，主要从事“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研究工作，以及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与社会中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进行综合型、全局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另外，“一带一路百人论坛”首届论坛于2015年8月8日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该论坛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报名工作，获得了200余位专家、企业和媒体代表的响应，是迄今为止自发性最强、人气最高的民间“一带一路”主题论坛。

随着中国国家在新型外交框架下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引起了国内很多学者的关注。相关的文章日益增加了。比如：陈耀（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发表文章《“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涵与推进思路》中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他说：“‘一带一路’作为对外开放的大战略，国家层面的对接十分重要，因此战略实施的进度和程度不能只取决于中方，还需要沿线相关国家共同努力。”

目前国内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在经济外交政策的关系方面。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界定、理论框架构建以及特定国家“一带一路”外交的整体研究方面仍缺乏深入探讨，全面、系统的研究及其理论成果则相对薄弱。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与安全问题研究方面还需要更多全面研究。

（二）国外研究现状

1、国外“一带一路”战略概念界定：

“一带一路”战略概念在目前还处于一个探究的过程中。之所以国外很多学者在尝试了解“一带一路”战略和要学习“带”和“路”代表什么？一方面有些学者用说“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另一方面有些学者说“One Belt OneRoad Project”。在外国学术界“strategy 与 project”这两个概念还存在概念界定的问题。

2、国外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研究：

国际学术界对“一带一路”战略反应热烈，美国学者认为中国为了应对“亚太再

平衡”而推出“一带一路”战略。在中国周边的国家中选择了更积极的回应。同时，有些国家则选择消极应对甚至采取针对性举措。在非洲，一些与中国关系紧密的国家表现出失落感。印度学者认为中国要提高其在印度洋的影响力，围堵印度。不同反应体现的共性是：比较重视“一带一路”，认为是中国单方的新地缘战略，或者是中国的重大规划，这个战略或规划借由中国的实力，不可能不对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几乎没有国家会认为这是一个单方倡议而不予理会。

随着中国在新型外交框架下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引起了国外很多学者的关注。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研究的相关文章日益增加了。不同的大学研究院、智库中心等等的学者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各个方面开始写了文章。查尔斯·克洛弗，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一带一路”：中国版的“大博弈”》中说道：“看起来旨在利用经济好处来弥补其他方面的欠缺的新丝绸之路的倡议，这就像马歇尔计划一样，”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Clingendael研究院的学者Frans Paul van der Putten发表文章《“一带一路”：欧盟安全战略的一个机会》中关于“一带一路”战略与欧盟安全战略分析说：“欧洲联盟为使稳定自己的邻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它应该欢迎相关各方加强其在这些地区的安全保护作用。“一带一路”将服务于双重目的。第一个是通过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主动一边可以密切关注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第二个是另外一边同时可以合作保护区域稳定。”¹

很多全球有名的智库中心已出版了不同的报告。针对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欧洲与全球经济治理实验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兰德公司、等10家全球顶级智库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报告做季度性综述。

零点集团整理分析了20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外媒体在2015年上半年有关“一带一路”的新闻报道。美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全国广播公司、福克斯广播公司、今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洛杉矶时报、BuzzFeed、赫芬顿邮报；日本：日本时报、读卖新闻（英文版）；印度：印度时报；俄罗斯：卫星网（英文版）；新加坡：海峡时报；英国：卫报、英国广播公司、每日电讯、金融时报、经济学人、每日邮报。

国外媒体态度与主要观点在于：

¹Frans Paul van der Putten: 《“One Belt, One Road”: An Opportunity for the EU’s Security Strategy》,(2015.12),
https://www.academia.edu/19712327/_One_Belt_One_Road_An_Opportunity_for_the_EU_s_Security_Strategy

正面态度：

- (1) “一带一路”有助于实现欧亚大陆的“大同梦”，对欧盟国家意义非凡；
- (2) 新疆的和谐稳定将提升中亚管道建设在此战略中的重要性；
- (3) 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制度优越性，中国得以崛起。

负面态度：

-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金融风险与政治风险等各种风险；
- (2) 在民族主义盛行的亚洲诸国，仅靠经济而缺乏软实力，推行“一带一路”恐困难重重。

国外研究的不足：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研究发展相对滞后，理论框架构建以及特定国家新媒体外交的整体研究方面仍缺乏深入探讨，全面、系统的研究及其理论成果则相对薄弱。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操作，研究的资料都较少。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上的空缺较大。

四、研究方法

(一) 文献分析法：收集、归类、整理当今中外学界有关“一带一路”战略的各种著作及论文，深入的了解这一课题，在此基础上提炼和创新出自己的观点。

(二) 历史分析法：广泛收集、整理有关文献和研究资料，史论结合地宏观地把握历史发展脉络。本文疏理了“一带一路”战略的起源及发展现状，理清了从国内学术界到国外学术界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资料；这样的疏理有利于对“一带一路”战略进行全方位把握，从而为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启示和借鉴。

(三) 比较分析法：确定比较对象及比较对象之间具有价值的比较项。通过对其进行分析比较，准确地判断“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形势，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提升相关国家的“外交水平”，为有关国家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创造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献计献策。另外，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多变量分析方法，应用其基本思想构建指标体系，对一带一路战略加以比较。

第一章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安全挑战

安全发展是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最关键问题，“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着恐怖主义、宗教冲突、民族冲突、大国干涉等“安全（传统和非传统）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方面共同面临着安全发展的挑战，另一方面存在着共同发展的安全共识与利益。

第一节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恐怖主义挑战

恐怖主义已严重影响到了世界各国的稳定，民众的安康，恐怖袭击的事件每天都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着。在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手段发生的恐怖袭击让世界震惊，也提醒全世界：恐怖主义的威胁离每个人都并不遥远。

从“基地组织”的9·11袭击，再到“伊斯兰国”的崛起，世界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地区或者国际恐怖事件。通过“打击恐怖组织”借口，美国进入阿富汗直到今天，不幸的是，国际恐怖组织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些年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恐怖袭击事件已不可计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组织被打倒了，但是另外一个组织反而逆势崛起。“伊斯兰国”取代了“基地组织”对国际恐怖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这让国际社会以打击恐怖主义为核心目标的反恐战略，基本沦为泡影。在美国进入阿富汗那段时间，世界始终没能更加安全，恐怖主义的回潮反而更加让世界忧虑，猖狂的袭击正在向地区化、国际化转变。国际社会花费了数万亿美元、数千人死亡的代价，不仅没有解决或削弱恐怖主义的威胁，反而有越反越恐的趋势。¹

巴黎恐怖事件发生后，四十多个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奔赴巴黎，手挽手公开谴责恐怖主义。但是，对于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巴勒斯坦、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天天都发生恐怖事件，国际社会却一次也没看到这么多国家领导人为了反恐而会面。这是西方社会在反恐上非常明显的双重标准，也是目前国际秩序在反恐上不公平和不平等的证明。这双重标准恰恰表现出西方在国际反恐上没有诚意的态度。2001年1月，布热津斯基在接受德国《镜报》采访时说：“美国在经济上是全球的火车头，在科技上是创新的源头，在军事上是唯一的全球性强国，甚至在文化上也有非同寻常的吸引力。美国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任何一个新政府都必须承担这个责任——世界已进入新的美

¹ 张家栋：《“恐怖主义威胁成为‘新常态’，谁之罪？”》，<http://www.chinathinktanks.org.cn/content/detail/id/2999596>，2016-09-20

国世纪。”但是，21世纪还没到其季度，所谓新美国的21世纪已经成为恐怖主义的“巅峰之作”。“9·11”事件发生时很多评论家表述说：“9·11”是世界恐怖主义的“巅峰之作”。但是ISIS的出现改变了人类对恐怖主义的认识。ISIS的强大深刻影响了世界安全形势和反恐格局。ISIS在全球恐怖主义历史上，写下了堪称最疯狂、最血腥的一笔。随着ISIS的崛起世界已经进入恐怖袭击高发期，很多不同国家和人民为此感到恐惧不安。

ISIS的协力比联合国安理会国家更厉害吗？ISIS成员具有的武器比安理会成员国更丰富吗？简单来问，ISIS比安理会成员国（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更强吗？如果答案是“是”的话，那只能说，人类在恐怖主义面前已无能为力。然而，如果答案是“否”的话，那笔者想要问：为了消灭恐怖主义，安理会为什么不进行协力？一边说“恐怖主义是人类的敌人”、“恐怖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安理会是人类安全的保障”，一边没有共同协力。从“反恐”角度来说，这目前存在的负面现状证明是现有代表国际安全秩序的安理会已无法满足国际安全局势。所以，联合国必须尽快建立新的一个安理会。该新的安理会必须平等的。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都应该有着平等的位置和话语权。

“一带一路”在发展阶段中，将遇到不同的问题，其中最大的安全问题就是“恐怖主义”。一共65个“一带一路”国家间20多个国家直接面临着“恐怖主义威胁”。剩下其他国家多有间接受到“恐怖主义”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面临着恐怖主义威胁的绝大部分的“一带一路”国家都是亚洲国家。这现实非常明显提醒亚洲国家在反恐态度上应谋求共识。影响力不断广大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尤其是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恶化趋势不断增加，在很多层面对“一带一路”战略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一带一路”的大型项目大部分是跨境性的。比如：跨境铁路项目。这些大型项目的稳定性都面临着恐怖主义威胁。因此，沿线国家都必须认真重新共商思考“丝路”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一带一路国家”重新需要有足够的对“恐怖主义认识”，为了沿线国家政治和社会安全，反恐防恐沿线国家各个必须承担起相关责任。

关于恐怖主义具有双重标准的西方已不会给亚洲的恐怖主义问题上带来一些好处或者帮助。所以，“一带一路”亚洲国家必须自己协力打击恐怖主义。因为地缘政治错综复杂的亚洲，所以地区各个国家都需要一起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协力消灭亚洲的恐怖主义问题。只有协力打击西方管理的恐怖主义，“一带一路”亚洲国家才能“共享”一个真正有安全的“新丝路环境”

第二节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宗教冲突挑战

从古到今，人类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经历过与特定宗教内部的分歧相关的暴力冲突。自宗教历史开始以来，宗教和教派冲突一直没有停止过。17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教派间的冲突引起了许多暴力冲突和国家间战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神权至上被主权至上取代，此宗教分歧而爆发的冲突和战争大幅度减少。另外一个例子，伊斯兰教历史上，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之后，穆斯林集团内部在谁来继任新领袖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并最终引发了伊斯兰教内部第一次教派分化。到目前为止，伊斯兰教派间发生了不同的教派冲突。比如逊尼派的奥斯曼土耳其与什叶派萨法维王朝的争夺，什叶派的埃及法蒂玛王朝与逊尼派的阿巴斯哈里发的斗争。迄今，无论发生不同的斗争，但是伊斯兰教教派间从来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

目前，“一带一路”最核心地区之一中东地区政治重新被“教派冲突”严重地威胁着。美国进入伊拉克以来，由于教派因素发生的冲突屡见不鲜，一直到今天的叙利亚局势没有停止过，反而不断深化了。“教派问题”是美国在“亚洲再平衡”战略下，想用的最核心的一副牌。通过教派冲突，美国要维持其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地位。因为，在中东发生教派冲突时，美国更容易实现其在中东的战略。中东的不安全局势越持续存在，美国越能够维持其在中东的存在。由此可见，美国在中东的存在对“一带一路”战略来说，是最大的危险和障碍。

美国从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一直是伊朗的敌人，但今天美国成了伊朗在中东的最大的支持者。因为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最核心内涵的副标题之一就是“教派冲突”。在“亚洲再平衡”战略下，美国在中东的目标就是发动“什叶和逊尼教派冲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美国撤军伊拉克之后留给伊朗“势力空间”。伊朗通过利用教派优势开始补足该新空间，导致伊拉克政治格局更不稳定。美国撤军伊拉克后，伊拉克政治格局向伊拉克什叶派的利益转变的现实是明显的证明。

宗教对新丝路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一个现实。因此，从长期性和稳定性角度来分析，宗教对“一带一路”的影响是沿线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必须认真考量和处理的关键事务。“一带”和“一路”沿线共有65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是完全同质的，都包括了具有不同种族、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各种各样的民族。沿线国家都具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和教派。而且，宗教文化在丝路国家人民心中的位置和感知，也是千差万别的。比如：中国新疆地区喀什穆斯林对宗教的感知、态度和赋予宗教的重

要性水平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基督教人对宗教的认知、态度和赋予宗教的重要性水平完全都不一样。所以，沿线国家必须意识到沿线地区人民的宗教要求。根据丝路国家人民的合理要求来制定和实现真正的“一带一路”战略。这任务对沿线国家来说，是完全不能忽略的。因为如果在实现“一带一路”战略过程当中，不了解本地人民和宗教关系局势，不管老百姓的宗教需求的话，首先美国等西方国家很容易可以找到在宗教上搞小动作的机会，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正在发酵的宗教问题就是一个很鲜活、明显的例子。西方国家通过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地人民宗教方面的不满足的情况，能够策划“宗教和教派冲突”来阻扰“新丝路梦”的实现。因此，沿线国家在宗教领域上应该协力制定“丝路宗教政策”，并为了避免将来会发生潜在的宗教和教派冲突，应共同采取措施。从目前的中东教派（逊尼派和什叶派）问题上来预测，如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能完成这一核心任务的话，将来在亚洲各个地区发生宗教和教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现实。

第三节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民族冲突挑战

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由单一种族形成的社会结构。每个国家有由许多不同种族组成的社会结构。各个民族的风俗和价值观都不一样。每个种族在宗教、语言、文化等上，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各族的宗教文化、语言文化、民俗文化都有其传统的特色。每个国家都存在这些差异给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由于存在这些差异，有时会发生社会性的问题。例如，由于语言上的差异有时会在社会上制造一些障碍，在社会上不同种族之间会发生沟通问题；由于种族间的宗教分歧造成文化习惯，也有时会导致在社会种族之间的问题。基于种族的这些差异，有时会导致小规模的冲突，有时会造成大规模的冲突。

目前来看，世界各国，都存在着本质不同的民族问题，即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国内以及跨国性民族冲突。共生的民族或族群快速带到了国家政治共同体之中，在政治共同体之中相处共生。各个种族之间的关系及其利益诉求上的差异，各种族间涉及着国家制度、政治结构、经济发展等问题造成的分歧、竞争、矛盾等，以及各个种族与国家间的关系，各个种族在中央政府中的法律位置等，成为当代社会公共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挑战是族际冲突发生的内生性和结构性的因素。如果处理得不好，未来就很可能转化为拥有破坏性的恶性冲突。保护疆域内的各种族的基本政治权利、经济发展、文化安全和话语权利，提供各个种族生存和发展空间以及法律权

力，从 21 世纪全球化、科技化、智能化和信息化趋势角度来强调，是各国家的首要和必要的职责、维持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本前提，值得注意的是，同时，也是它获得国际舆论的尊重和认可的关键要求。

“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都具有民族多元的社会结构。比如：中国 56 个民族，印度一百多个民族等。历史在不同的时间见证了许多不同的种族冲突，这经历过经验为我们认识民族冲突的发生提供了背景。例如，塞尔维亚和波黑民族冲突。同样，在目前的情况下，不仅仅是国内层面，而且国际区域层面的冲突仍然存在。从古至今继续的种族冲突经验，提醒“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预防潜在的民族冲突必须建立联合协商平台。沿线国家现有的许多民族冲突，是从殖民主义时代被继承下来的。因此，沿线国家必须共同考量民族冲突的因果、为解决冲突问题必须制定和发展共同政策、共同努力处理好民族问题。如在跨界型民族冲突上，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对冲突起因，沿线国家共同进行研究和分析，从根本上消除族际冲突产生的根源、实现多元社会的长治久安、共同采取保护各个民族权益的措施。从跨界型民族冲突角度来说，因无合理不平等的政治权力配置矛盾而导致的冲突、由不同种族间的不平等经济发展和利益分享问题而导致的冲突、因不同种族间的教育、文化等领域不平发展所滋生的情感和各种族拥有的群体心理因素所造成的冲突，这三个角度互作效应，互相依存。否则，将来可能出现的冲突，会恶化沿线国家社会秩序，从而破坏“一带一路”战略愿景下产生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上述分析表述的共同措施，是新丝路国家绝对不能忽略的工作。

第四节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大国干预的挑战

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亚洲地区的位置排第一。因为，通过中国崛起，世界经济势力中心开始从西方转移到东方。随着亚洲开始成为世界经济势力中心，同样亚洲的全球地缘政治影响力也开始增强。

从美国的亚洲战略角度来看，东亚洲的“东南亚地区”和西亚洲的“中东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上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美国其大部分的战略力量都放在这两个地区。因为，东南亚是美国阻扰中国崛起的战略围堵区域，中东是美国保护以色列安全的战略任务区域。美国通过“亚洲再平衡”战略考量，要获得其在亚洲的战略利益。为了深入解读“亚洲再平衡”战略，对亚洲两个地区必须进行深刻分析。

“亚洲再平衡”战略是亚洲海陆秩序，地区安全秩序，进行博弈的理论性基础。

通过进行如“萨德”入韩等军事活动是从军事上围堵亚洲，通过建立如 TPP、TTIP 等不符合亚洲地区的经济机制，实际上是从经济上围堵亚洲。

从东南亚范围来分析，美国为了保持和扩张其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不断深化、提高和本地区盟友的关系。为这一目标美国跟其盟友进行新军事和经济合作。2011 年，奥巴马在夏威夷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提出“转向亚洲”战略。美国开始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出，同时寻求新外交政策和新地缘战略。奥巴马团队执政以来，美政府在“巧实力”的概念下调整了战略选择，决定把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

2012 年 6 月，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提出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指出美国将在 2020 年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届时将 60% 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2014 年 4 月，“美国-东盟防务论坛”在夏威夷召开，美国首度以东道主身份主办美国与东盟之间的部长级非正式会议。会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将启程访问日本、中国、蒙古国，奥巴马 4 月下旬将出访亚洲。美领导人出发前在家门口“挽”住东盟“秀”姿态，实质是重申其战略重心不变。哈格尔在此次论坛中反复强调，希望向与会东盟国防部长及代表重申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美方期待将这一论坛活动“常规化”，释放出“亚太再平衡”将会延续的信号。¹

美国继续巩固与韩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关系，并加深与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伙伴的关系。美国亚太双边同盟体系形成多边互动频繁的战略伙伴关系网络。美国一边要盟友分担军事责任，另一边寻求伙伴与盟友间强化安全合作，目前，尤其是鼓励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与越南和菲律宾深化海上安全合作。提高伙伴和盟友的海军能力和海洋领域意识是其合作的关键点。特别是美国进行“萨德”入韩给地区带来新的地缘战略压力以及新的不确定性。

美国继续加强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关系。印度尼西亚总统提出“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力图促进印度尼西亚国内设施联通和海洋资源的开发，将印度尼西亚打造成为“印太中心”和“世界海洋轴心”。美国认为印度尼西亚的这一战略为美国提供了新的地缘战略机遇。

除此之外，在美国布局“印太”之际，美印关系继续强化。美国在 2015 年《美国亚太海上安全战略》中指出，“印度的‘向东干’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有战略交汇

¹“亚太再平衡”且行且观望(图). 网易新闻.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bqXCFuDESysKVvVU_UL0A62G5JWrsgJ0zMZ140X8STR62P5MbnJQg9U6e5XvBfYIOstIytqAzGbzJdt7dHaMCKtZmdRK6PAaKoUbddE2aYbguLjJMfdGk09d0gEsoh3Bs4St8v_ES11RORG2b7ucWYUGGgekhWXSAL2v8Vvh6u, 2014-4-5

点，我们寻求加强印度在印度洋以及其他地区作为纯粹的安全提供者的海上能力”。可以说美印合作的强化，是两国战略需求契合所致。¹

2015 年美国高官和军事官员常常访问东南亚，强调该地区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重要位置。美国增加对伙伴和盟友的军事援助，在提高他们海上安全能力的同时，在东南亚进行以轮换部署军事活动。显而易见，最新的军事行动“萨德”入韩表现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意图。

从中东范围来分析，美国的西亚战略中“中东地区”具有独特性的位置。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盟友就是以色列。因此，从以色列角度来看，美国是其在中东地区最大的保护者。美国在中东存在的最大目的是保障以色列的安全。之所以，美国的中东政策跟以色列安全有着平行关系。

让中东地区在世界上成为最不稳定的地区的大原因就是“巴以冲突”。除了双方以外，巴以冲突也是关系到整个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国家。除了地缘政治经济因素以外，具有一定的宗教因素。因此，由于“巴以冲突”，以色列被全世界伊斯兰国家看作是大威胁。随着该冲突一直持续下去，中东地缘政治和经济直接受到美国代表的西方阵营的多维干预。比如：2003 年，以英美军队为主的联合部队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实质上是趁机清除伊国内的反美政权。

东南亚地区对“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来说，是在“海上”具有最核心地区之一。中东地区对“陆上丝绸之路”战略来说，也是在“陆上”最核心地区之一。美国在两个地区的霸权存在完全对“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很大威胁。

美国正式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前，随着进入阿富汗已开始进行“再平衡”战略。“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进入阿富汗，在 2011 年开始从阿富汗战争撤出。但是今天，阿富汗政府正不断继续打击恐怖组织，阿富汗国家安全仍然处于恐怖主义威胁下。阿富汗地区已成为很多国家情报机构的势力角逐场。因为，美国进入阿富汗直到撤出过程当中，根据其战略利益在安全领域上进行“再平衡”战略。

从新兴大国关系角度，如果中国以中东地区的共同利益跟美国建立和发展新关系的话，将一定会给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关系带来负面影响，这完全不有利于在中东地区顺利实现“一带一路”战略。为了顺利实现该战略，中国应该跟中东“一带一路”沿

¹中美博弈：“亚太再平衡”与“一带一路”（上）、原创 2016-04-11 曹筱阳中国经济报告

线国家建立更多的战略伙伴关系。如果在“复兴丝路”口号下，可以把中国和中东关系培养成为整个中东沿线国家间的多元性关系的话，“一带一路”战略可以更顺利实现和达到其长期性和稳定性目标。“一带一路”战略在中东是否成功，取决于中国和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间的战略关系，而不是中国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共同利益。

虽然是中国和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在亚洲都具有共同战略利益，但是，一个复兴强大的中国是西方不想看到的现实。在一个强大的中国，对西方国家在亚洲的战略利益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今天的中国崛起代表着亚洲的崛起。亚洲的崛起代表着东方文明的崛起。东方文明复兴肯定会动摇西方文明的基础。为了阻扰这历史性的崛起，美国领导的西方智囊团肯定会思考创新创造新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已成为典型的例子。新战略的第一目标肯定是在安全领域和经济领域上，与盟友建立新的关系和进行新的合作，来阻碍东方历史性崛起。

美国特朗普政府充满不确定性。他在竞选过程当中给世界留下的影响很复杂。美国新政府的亚洲政策何去何从，很不容易预测。在 21 世纪，亚洲舆论从奥巴马八年执政经验中，已非常深刻了解美国的亚洲政策。奥巴马刚当选时，世界舆论开始培养“世界和平欲望”。但是八年的经验让国际舆论，尤其是亚洲舆论非常失望了。八年来的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是很明显的证明。

“一带一路”战略在亚洲逐步达到其目标标志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开始减少。因为“一带一路”通过具体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反映出实在的国际政治。反而，美国把自己的亚洲政治，一直通过霸权主义、外交游戏、恐怖组织等方式推行下来。现在它想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保持其在亚洲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为了保护其霸权地位，将不断继续扩展和实现“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内容。从“一带一路”共同发展战略角度来看，这提醒亚洲国家，在安全领域上，必须建立亚洲版的新型安全关系。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是通向“安全亚洲”目标路上新的一个希望和途径。因此，“一带一路”需要安全环境和现代安全基础。

第二章 “一带一路”战略与地区安全

安全并非“新丝绸之路”建设之导向，但被“安全化”的难题，即客观存在各种各样的安全挑战时刻困扰着“新丝绸之路”的建设。发展虽然是消除不安全根源的一种方法，但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够成为滋生和加深各类安全风险的因素。新丝绸之路建设存在比较为明显的“安全威胁”，安全保障围绕面广、不可预测性强，应对难度大。为促进“新丝绸之路”共同发展战略的顺利落地，不仅需要寻求深化经济合作的创新性思维模式，也需筹谋如何有效地应对安全保障问题，新丝绸之路建设的安全保障，其关键挑战在于兼顾发展安全两件大事，解决好“发展—安全相互联结”的难题。

第一节 “三共”原则与地区安全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简称“三共”，指的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共建”原则。共建“一带一路”的总体思路是，共建“一带一路”，将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以“五通”为主要内容，全方位促进合理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讲话中指出，“共商”，就是集思广益，好事大家商量着办，使“一带一路”建设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体现双方智慧和创意。“共建”，就是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双方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聚沙成塔，积水成渊，持之以恒加以推进。“共享”，就是让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中阿人民，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等综合安全）是共建“一带一路”战略面前的最大障碍。安全问题，在联合制定和顺利实现该共同发展战略过程当中以及为维护该战略的长期性和稳定性面临的最重大和最敏感的挑战。在“一带一路”区域里面所有的国家直接或间接面临着安全威胁。

随着科技的创新发展，通讯和交通的全球化带来的新国际趋势导致有些国内的安全问题在很短时间内飞速地变成区域安全问题，甚至可能变成全球性的安全问题。比如：网络恐怖主义。这具有跨境特征的新安全威胁趋势使各国在安全领域更加相互依赖。世界国家之间的相互安全依赖性不断增加和深入。

区域性和全球性新安全威胁催生了“共同安全感知”。该新安全感知导致“新安

全观”、“共同安全”、“安全共同体”等概念的产生。世界不同的国家开始创新发展新安全理念。比如：“亚洲新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关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等综合安全问题，是对 20 世纪中中国、印度、缅甸等国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续和发展。¹

在综合安全问题框架下，地区国家的“安全命运”慢慢开始变得更加共同化。新安全威胁带来的这一现实情况在解决地区安全问题方面不断强迫着地区国家采取“共同措施”。为避免迅速接近着的显现性和非显现性的新安全威胁，有些国家主动提出新的战略。比如：中国主动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该战略基于“共建”原则的“共同发展战略”。

上述的分析表现，安全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最关键需求。在“地区共同发展与安全关系”评价下，很明显看得出来就是“共建”原则在地区安全领域下要求“一带一路”区域各个国家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来共同建设一个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新“丝绸之路”。为了达到顺利制定和实现“丝绸之路”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区域一体化目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共商”原则必须达成“地区共同安全”的共识。“一带一路”战略的“三共”原则对相关地区安全利益提供历史性和战略性的新机遇。如果相关“一带一路”国家达成“共同安全”的共识的话，这会导致丝路区域的安全秩序翻天覆地的转变。

“共同安全”共识的成功达成对“一带一路”区域安全利益具有战略性的意义。“三共”原则给“一带一路”成员国提供可以发挥“共同潜力”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所有的成员国可以集体行动，发展“共同能力”。为了消灭对“一带一路”战略安全的威胁，“共同能力”是可以共用的金钥匙。在制定和实现“一带一路”战略过程当中，为了能够共同为安全威胁而奋斗，这条金钥匙是绝对必须具备的一种战略工具。只有“一带一路”区域国家发展“共同能力”，“安带安路”（安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安全海上丝绸之路）的大门才能打开。

一、“共商”原则与地区安全

（一）“共商”原则基本内涵

¹和静钧（察哈尔学会研究员）<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2014/05/19/317348.html>

“共商”，即在整个“新丝绸之路”建设当中尊重沿线各国对各自参与的合作事件的话语权，恰当处置各方利益关系。沿线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可以主动出谋划策，都可以就本国需要对多边合作议程形成影响，不干涉别国所选择的发展路径，通过多边沟通和磋商，优势互补，对接发展战略，平等地参与到“一带一路”共同发展战略中来。

共商“一带一路”旨在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中国倡议，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2014年6月，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可以看作中国对新全球在地主义的进一步描绘。显而易见，“新丝绸之路”建设的首要原则“共商”就是指建立“共同体”的初步沟通。

（二）“共商”与地区安全利益

在经济、经融、科技等方面迅速全球化的世界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不仅是威胁有关国家，也是直接或者间接威胁其周边国家的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等等。在不同领域里发生的不同安全问题现在已经会超越有关国家飞速溢出蔓延到周边国家或者全世界。21世纪给人类带来的这种新的安全威胁趋势前面，有时一个国家单独克服不了有些安全困难。在很短时间内可溢出和蔓延的各种各样的安全威胁已开始迫使地区或者全世界国家在不同的安全领域上达成共识和进行合作。

“一带一路”共同发展战略倡议的“共商”原则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不同的安全领域上为了进行新的安全合作提供新的“共商安全”机会。为抓住该机会，依托“一带一路”战略的“共建”原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共建一个开放透明的“共商安全机制”。通过“共商安全机制”“一带一路”地区国家可以共同创造可充分共商安全问题的平台。

在创新开放新型的共商安全平台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于“一带一路”战略面临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沿线各国必须共商制定促进丝路地区安全合作的谋划和措施，对接丝路共同的安全战略政策，协商解决，达成共识。总的来说，必须共同考量分析安全问题的因果和制定解决方案，为务实合作和实施大型项目供给安全

战略和政策理论支持，必须共同贡献为增加“新丝绸之路”地区的安全水平。

（三）“丝路共同安全共商机制”

在“共商”原则的基础上，最重要的前提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分析威胁“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问题上面应该达成“共商安全问题”的共识。通过达成安全共识之后，沿线国应共建一个“共同安全共商机制”。通过现场采访分析不同的沿线国学者和人民对“一带一路”与“丝绸之路”这两个概念的感知，笔者建议，为了消除对该战略的怀疑、为使该战略转化为更深刻的共同产品和价值，按照适应于“一带一路”的灵感源泉，该机制的名字可以通过“共商”方式制定为“丝路安全共商机制”。该机制应有三个基本任务：识别，诊断，分析

第一项任务是识别安全问题。沿线国家通过去正确地识别威胁“一带一路”地区的安全问题。用这种方法来明确界定具体的安全问题。比如：网络安全问题、信息安全问题、金融安全等等。最后沿线国家应做“安全问题识别分析报告”。

第二项任务是诊断安全问题。沿线国家通过共同能力去正确地诊断威胁“一带一路”地区的安全问题。用这种方法按照因果关系来明确分析安全问题的作用和影响。比如：网络安全问题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作用和影响。最后沿线国家应做“安全问题诊断分析报告”。

第三项任务是分析安全问题。沿线国家通过共同努力和协力去正确地分析威胁“一带一路”地区的安全问题。用这种方法去寻找安全问题的战略性解决方案和执行战略性成本计算。最后沿线国家应做“安全问题分析报告”。

二、“共建”原则与地区安全

（一）“共建”原则基本内涵

“共建”，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坚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共同地开展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文化在内的对沿线国有利的实现多赢的新丝路建设。

“共建”原则，代表着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沿线国家共同开展建设“安全的世界”、“安全的亚洲”和安全的“新丝路”，通过沿线各国的努力来协力创造新的丝路文明、共同贡献东方的历史性复兴和崛起。

（二）“共建”与地区安全

“共建”，代表着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沿线国家通过共同建设方式，筹建

大项目来制定和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从“一带一路”的“五通”内容角度来看，全部都是具有跨境和多维的大项目特征。实现这些规模大型的项目都需要沿线国家的协力。

目前的亚洲诸多国家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尤其是非传统安全的新国际趋势严峻威胁地区安全格局。例如：恐怖主义。通过网络的发展，恐怖主义的区域性特征转变到国际性特征。ISIS 崛起已成为典型的例子。在三年的时间内，通过网络的帮助，它影响力扩展到全世界。非传统给带来的这新趋势，让世界各国重新考量网络空间上的“安全”。由于这新的“安全威胁”，有些国家为了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开始发挥协力作用。

从上述分析角度来说，沿线国家通过“一带一路”的“共商”原则，必须发展新的“安全意识”，就是“共同安全”。因为，一个国内发生的安全风险，很快会延伸到周边国家。有这样安全现实下，地区国家无法在安全方面建立多种新关系。所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共建”原则，必须建立新型的安全关系，来应对“一带一路”的大型项目面临的安全威胁。如果，沿线国家不能发展“共同安全”意识的话，很难在安全领域上达成共识，也不会保障“一带一路”战略下，共建的大型项目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必须通过“共商原则”，来共建安全的丝绸之路。从海上和陆上的潜在的安全威胁角度来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单独克服不了。通过“责任共同体”意识，沿线国家在安全方面，必须共建“安全共同体”，来保障“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行。“一带一路”战略的“共建”原则，给沿线国家提供共建安全的丝绸之路地区的机遇。

（三）丝路安全共建机制

基于“共建”原则，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该在解决威胁“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问题上达成“共建共同安全”的共识。在达成安全共识之后，沿线国家应共建一个“共同安全共建机制”。笔者建议，为了消除对该战略的怀疑、为使该战略转化为更深刻的共同产品和价值，按照适应于“一带一路”的灵感源泉，该机制的名字可以通过“共商”方式制定为“丝路安全共建机制”。该机制应有两个基本任务：制定共同安全政策，实行共同安全政策。

共同安全政策的基本目的是发展和强化“一带一路”地区的安全、提高“一带一路”地区的安全水平。在共同安全政策基础上，推动新的共同安全战略来为“一带一

路”地区的安全做贡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于“共建”原则应该制定共同安全政策。如果共同安全政策帮助成员国在彼此之间建立共同安全责任的话，那么“一带一路”地区的安全利益将会得到维护。为应对共同安全威胁，成员国应该采取共同安全措施。

“一带一路”战略在国际关系上的影响不断增加。56个国家已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如果成员国在安全领域上可以达成共识和集体行动的话，“一带一路”战略在国际关系上会获得更多战略性的地位。这成功可以让“一带一路”区域更安全。只在一个真正的安全区域环境里面，所有的“一带一路”战略下策划的成本多和规模庞大项目都才能可以保持其长久性和稳定性的特征。

三、“共享”原则与地区安全

（一）“共享”原则的基本内涵

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寻求利益最大公约数是一直以来的共识。10月16日，印度果阿，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大范围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题为《坚定信心共谋发展》。信心要坚定，目的还是为了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的成果。¹

“共享”原则，代表着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沿线国家共享“五通”内容所产生的发展的成果，通过共同开展建设安全的“新丝路”，以及沿线各国的努力来协力创造新的丝路文明、来共享东方的历史性复兴和崛起。

（二）“共享”原则与地区安全

“一带一路”战略在多种领域上给沿线国家提供共同发展机遇。顺利实现“一带一路”的“五通”内容，旨在产生共同发展的成果，共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让沿线国家和人民来共享共同发展的成果。

在地区各个国家的命运不断变得相互依存的时代下，随着近代大国经济发展对石油、煤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极大需求，以及对市场不断扩展、对资源不断掠夺的需求，地区各个国家的关系深化和相互依赖增加，“共享”意识开始引起人类的关注。正如习近平主席，2015月9月在联合国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我们要将口头承诺转变为实际行动，共同营造人人免

¹微信关注:学习大国，“行动共同体”——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三个“共同体”①, (2016-10-15)

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的前景。”¹

通过达成“共享”的共识，并“共享”意识的发展和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可以获得新的层面。基于“共商”原则协商解决丝路上会发生的问题，沿线国家协力顺利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五通”，能够建立命运共同体的绿色丝绸之路，。应当更强调是，没有安全保障的共同发展环境里谈“共享”是白日做梦。中东地区非常典型和明确的证明。

总体，“一带一路”战略的“共享”原则，能够使沿线国家获得新的战略视野。从古代丝绸之路经验角度来看，“共享”原则保存着深刻的战略利益。如果沿线国家在安全概念上能够达成共识的话，可以建设具有“三个共同体”特征的安全的新丝路。这样历史性和战略性的成功将会给丝路地区安全利益作出巨大的贡献。只有成功了上述的“共商”和“共建”两点，才能保证“新丝绸之路”建设的果实能够被沿线国家人民所共享。

第二节 “五通”与地区安全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议了共建“一带”倡议，同时提出了“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简称“五通”）的建设路径。2015年3月，中方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对“五通”进行了拓展和阐释。

一、“政策沟通”与地区安全政策

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强化政府间政治合作，构建沿线多层次多方位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推进政治互信，达成共同发展合作新共识。新丝路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足交往对接、规划和制定，发挥协力作用解决共同发展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支持务实合作及新丝路上大型项目建设。

政策沟通位列“一带一路”的“五通”内容之首，可以看出其在“一带一路”共同发展战略倡议中的主要角色与前提作用，既是实践共同发展战略的政治基础与前提条件，又是“助推器”与“催化剂”，包括双方基于共同理念（开放包容、互利共

¹ 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页2，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

赢)、共同利益(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发展利益)、共同任务(维护发展与安全)的政治互信,以及政策协调乃至战略协作。

政策沟通是开展多方合作的前提。充分的政策沟通为促进顺利制定和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重要保障。2015年,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出席“亚洲政党丝绸之路专题会议”的外方主要代表时发表讲话,对“政策沟通”进行了系统阐释。习近平强调政党和政治家应具有远见卓识和历史担当,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走在前列,具体包括“三大使命”:一是“既要登高望远,又要脚踏实地”。“登高望远”就是要顺应时代潮流,做好顶层设计;“脚踏实地”就是要有序推进,争取早期收获。二是“既要加强对话沟通,又要促进战略对接”。要紧密结合各自国家改革发展实际,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坦诚对话,为共建“一带一路”提出合作举措。三是“既要积极主动发声,又要汇集各方力量”。政党和政治家应主动引导、协调和组织政治力量、智库媒体、工商企业、民间组织等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各领域交流合作,营造良好的政治、舆论、商业、民意氛围。¹

(一)“政策沟通”与地区政治安全

“一带一路”地区特别是亚洲区域一方面正在快速发展崛起和现代化,另一方面面临着明显或者隐藏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大国干预、国际恐怖主义、种族冲突、宗教冲突等等。所有的亚洲人面临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安全威胁。目前有些亚洲国家没有很大的安全问题完全都不意味着明天也不会发生有些安全威胁。因为对一个国家或者区域来说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保障。

然而、有些安全问题现在已经具有迅速区域化和全球化的特征和潜力。例如:国际恐怖主义通过网络联系方式在很短时间内扩张影响力的趋势。这现实的安全威胁局势迫使有关地区国家在某些安全领域上进行“共同安全合作”和共同发展解决战略。因此,为共同奋斗打击共同的安全威胁地区国家制定共同安全政策大大降低共同安全威胁。

“一带一路”的“政策沟通”内容,给沿线国家带来新的共商地区安全问题的平台。随着“政策沟通”内容日益明确,沿线国家也开始高度关注“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才刚刚上路。从“五通”内容角度来说,沿线诸多国家正在了解认知过程当中。因此,沿线国家政治层面也还没有共同“一带一路”和“五通”政策。“政

¹陈向阳 徐进:“政策沟通:建立互信合作的制度框架,政策沟通的内涵和外延”, (2016.07.11)

策沟通”是在多种领域多维度的合作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尤其是安全领域方面。

从区域性和全球性新安全格局和风险角度来分析，“政策沟通”是对沿线国家在各种安全领域上提供新的达成共识的机遇。在影响力不断增加和深化的安全问题新趋势下，“政策沟通”对沿线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方面具有战略意义。因此，“政策沟通”给沿线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提供共同创新发展地区安全政策的战略机遇。通过“政策沟通”沿线国家必须筹建共同安全政策，对地区安全能够作出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二）“丝路共同安全政策”

基于共同发展战略，积极共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丝路共同安全共商机制”和“丝路共同安全共建机制”，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府间“丝路共同安全政策”合作，可以为开展“一带一路”务实合作、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提供政策支持，深度融合“一带一路”区域利益，最终达到共同发展的目标。

“新丝绸之路”国家间的政策沟通可以反映沿线国在政策高层上的共识和互信，是展开多方合作交流的基础，共建新的交流平台。同时，构建“丝路共同安全政策共商机制”其本身的政策环境也从整体上反映了“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安全政策沟通的稳定性和长久性。

二、“设施联通”与地区基础设施安全

（一）“设施联通”的基本内涵

设施联通的具体内容在《愿景与行动》中没有严格界定，但与跨境、跨区域合作有关的交通、能源和通讯基础设施的联通被指定为优先发展的领域。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重沿线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强化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主干通道建设，逐渐形成连接亚非欧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足思考气候变化因素。

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主要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增加海上航线和班次，加强海上物流信息化合作。拓展

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加快提升航空基础设施水平。

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

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加快推进双边跨境光缆等建设，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完善空中（卫星）信息通道，扩大信息交流与合作。¹

（二）“设施联通”与地区基础设施安全

在“新丝绸之路”建设和发展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起着先导性的作用，互联互通本身既对“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有着重要的经济贡献，又为其他“四通”提供着强有力的基础性支撑。

设施联通是一个立体、多元化和多维度的综合基础设施网络，涉及沿线国家领土主权、法律规范、技术标准、环境评估，更涉及沿线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人，以及项目的设计、融资、施工、运营管理等众多领域、方面和层次。对于一个如此庞大的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沿线国家统一认识、积极参与、共同谋划、共商解决遇到的各种各样安全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的“设施联通”内容涉及成本很高、规模庞大和跨境性的国际项目，既包括跨国交通设施（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也包括跨国能源设施（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通讯、电力、供水和供暖管道与设备等），还包括文化社会公共服务设施（教育、医疗卫生、商业服务、金融保险等）。

“一带一路”战略的大型项目具有超越边界的特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多沿线国家还有许多的传统或者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些安全问题直接或者间接威胁上述的大型项目。这些事实，迫使沿线国家在安全领域上来进行新的战略评估。由于大国干预，尤其在中亚、南亚和西亚地区存在的战略竞争是顺利制定和实现“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最大的障碍。

“共商、共建、共享”整个“一带一路”过程都需要保证一个安全的环境。大型项目特别要求安全上的保障。从上述分析角度来看，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筹划的大型项目将会给沿线国家带来新型的安全责任。在此过程当中，沿线国家要求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者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由于

¹王义伟：“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页 218，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

大型项目建设时间长，资本投资高，容量巨大和具有跨境性的特征，沿线国家需要崭新的安全意识和共识去维护这些大型项目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因此，各成员国亟需达成新的安全共识。如果在安全共识上可以获得成果的话，该战略性的成果不仅会有助于保证投资安全，也是会提高“一带一路”地区基础设施的安全水平。

三、“贸易畅通”与地区经济安全

（一）“贸易畅通”的基本内涵

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经济内容。宜着力研究解决丝路地区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解除沿线地区面临的投资贸易障碍，构建地区内和沿线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贸易互联互通的合作潜力，做好合作蛋糕，扩大合作范围。

可做的工作有：丝路地区沿线国家强化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海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统计信息、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促进丝路地区《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和实施；拓宽新丝路地区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挖掘贸易新增长点，推进贸易平衡。创新贸易方式，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的商业业态。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巩固和扩大丝路地区传统贸易，大力发展战略服务贸易。把沿线地区的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起来，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加快沿线地区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拓展沿线国家相互投资领域，加强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推动新兴产业合作，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推动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优化沿线地区产业链分工布局，促进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鼓励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提升地区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二）“贸易畅通”与地区经济安全

从目前的世界经济角度来看，现有的国际经济危机是区域性或者国际性的经济发展战略面临的最重大的发展问题之一。经济危机的历史和经济的历史一样古老的。经济危机出现的可能性，从经济活动开始的时刻就一直存在。这个可能性以能够涵盖整个世界的规模发生了三次。发生的经济危机，有时影响了一个国家或者区域，有时影响了整个世界。遍布了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在1929、1973和2008已出现了。

在2008年出现的危机仍继续影响整个世界。由于美国最大的金融企业之一“雷曼兄弟

公司”的破产，美国开始进入深刻的经济危机。这场在美国开始后来延伸到欧盟国家的经济危机，在欧洲经济上创造了严重的震荡。由于该危机衍生负面的经济结果，许多欧盟国家接近了崩溃的状态。

自 2008 年以来，由于在美国，经济上的焦虑、就业上的困难和房地产上的问题，在欧洲高度政府债务和银行业问题，全球经济出现了新的衰退局势。全球化和世界经济融合在一起导致该危机的迅速蔓延。尤其是在欧盟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欧盟国家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导致和欧盟国家直接或者间接具有经贸关系的国家开始担忧。根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造成的担忧导致该问题留在世界市场的议程上。

全球金融危机加大了世界各地经济的不确定性。该不确定性在投资和消费决策上产生了负面影响和导致经济活动的衰退。全球金融危机在许多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出现了消极事态发展。宏观经济数据开始出现显著的变化、失业率增加了和贫困趋势开始出现了。由于贫困率增加在许多国家里也发生了不同的社会问题。根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带来的新局势迫使各个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上承担更多的责任。

从“一带一路”经济共同发展战略角度来看，上面分析的世界经济危机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安全利益提供了大量的经济经验教训。美国主导的霸权世界经济秩序损坏了很多国家的经济利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因美国的不平等霸权国际经济政策而进入经济危机，并面对破产的风险。该具有霸权特征的世界经济秩序导致许多国家陷入贫困的困境。严重的贫困问题开始震动这些国家的社会秩序。

总体而言，这严峻的局势开始威胁相关国家的安全。因此，“一带一路”地区国家为了避免在未来可能将会发生的经济危机应该深度分析利用美国霸权经济秩序给世界带来的经济经验教训。为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安全利益，“一带一路”地区国家应该共同制定经济安全政策，并通过具体行动应对经济安全威胁。“一带一路”地区国家的经济安全命运不可以在美国主导的霸权经济秩序手里。为了顺利制定和落实“贸易畅通”目标，沿线国家必须制定共同经济安全政策。只有这样，“一带一路”的“贸易畅通”目标才可以顺利落实，并且给“一带一路”地区提供经济安全利益。

四、“资金融通”与地区金融安全

（一）“资金融通”的基本内涵

资金融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支撑。深化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促进丝路

地区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新丝路地区多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新丝路地区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共同促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沿线各方就共建上合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

加强新丝路地区的金融监管合作，促进签署多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逐渐在地
区内建立更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完善金融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共建地区性
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新丝路地区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加强征信
管理部门、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新丝路各国主权基
金作用，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新丝绸之路”建设。

（二）“金融安全”的基本内涵

金融的安全指货币金融通和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
展的今天，金融安全在国家经济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加强。

金融安全是和金融危机、金融风险联系在一起的，既可用风险和危机状况来解释
和衡量金融的安全程度，同样也可以用安全来解释和衡量风险与危机状况。金融安全
程度越高，风险就越小；反之，金融风险越大，安全程度就越低；危机是风险大规模
积聚爆发的结果，危机就是严重不安全，是金融安全的一种极端表现。

（三）“资金融通”与地区金融安全

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希望展现大国责任
为世界经济带来新动力。因此，中国在 2013 年倡议了共建“一带一路”战略。“一
带一路”战略旨在共同经济发展。为了落实“共同经济发展”目标，中国主导建立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丝路基金。通过两个新结构旨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世界贸
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世界经济发展，自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危机给
世界经济和各国内部带来了诸多非常严峻的问题。除了美国金融危机以外，“阿富汗
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内战、乌克兰危机”等都负面影响了世界金融格局。这些
事情都让很多国家在金融上付出代价。由于金融危机，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缓慢
了。

美国是世界经济风险之源。每次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美元反转都导致发展中国家
都经历大的金融危机，打击这些危机国家的经济长达十年或更久。20 世纪八十年代
的拉美经济危机与同期强势美元密切相关。当时，为摆脱滞涨局面，美联储强力提升
美元利率，1980 年 4 月联邦基金利率提升至 17.61%，世界进入美元时代。其后，里根

入主白宫，提出稳定货币供应量、减轻税负、缩减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四项措施，美国实体经济重新恢复增长，进而带动美元出现了 5 年的强势上涨周期，曾一度高达 158 的美元指数直接导致了美元超过 80% 的上涨幅度。伴随着美联储加息临近，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货币政策外溢效应将会是全球金融市场最重要的不确定因素。¹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已八年、世界经济还没有走出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这场金融危机是美国主导的霸权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在笔者看来，国际金融危机积极提醒告诉“一带一路”国家在金融上，应该进行共同采取金融安全措施来保护共同金融利益。资金的自由和便利融通需要安全的金融环境。因此、“一带一路”国家应该加快建立一个安全的金融环境。因为安全的金融环境是“一带一路”共同发展战略的最关键前提之一。之所以、推动新的共同金融安全战略来为“一带一路”地区的金融安全做共同贡献。

（四）丝路金融安全共管机制

“一带一路”共同发展战略要把目前的国际经济趋势拉回正轨，避免亚洲重新陷入金融危机陷阱，在推动国际经济合作、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两方面，“一带一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国家对金融形态的认识和表述也在不断的丰富，金融安全就是其中一种表述。以前负面经历过得亚洲金融危机、现有的美国金融危机、国际金融领域上的创新变化，比如互联网金融等新趋势都标志着是为了顺利落实“资金融通”目标，“一带一路”区域国家应该发展新的“金融意识”。从这角度上亟需建立“一带一路”特色的金融共商平台。通过建设“丝路金融共管机制”，区域国家可以防止“一带一路”区域外金融危机蔓延至区域内，防止西方经济危机传染至“一带一路”区域。

“丝路金融安全共管机制”作为“一带一路”区域的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在各金融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在广大会员机构和从业机构的参与和支持下，认真履行自律职责，维护行业发展次序，为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规范发展、行稳致远做出积极的贡献。总而言之，尽管目前发展中国家没有面临着像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那样恶劣的投资环境，但必须重视潜在的危急形势。须达成阻止亚洲金融危机重演的共识，通过积极的共同金融安全政策措施稳定经济和资本市场，以防止大幅资金外流，并阻碍区域外

¹Hakan AY, Öznur UÇAR:《三个全球经济危机的分析》，Dokuz Eylül 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杂志，(31.08.2015)

的危机渗透入区域内。

五、“民心相通”与地区文明安全

(一) “民心相通”的基本内涵

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社会根基。弘扬新丝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沿线文化、教育、智库、媒体等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在具体形式和方案上，有：扩大丝路国家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向沿线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促进旅游合作，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积极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为有关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和应急医疗救助，在妇幼健康、结核、残疾人康复以及艾滋病、疟疾等主要传染病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加强科技合作，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海上合作中心，合作开展重大科技攻关，促进科技人员交流，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强沿线国家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重点面向基层民众，广泛开展教育医疗、减贫开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保等各类公益慈善活动，促进沿线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加强文化传媒的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利用网络平台，运用新媒体工具，塑造和谐友好的文化生态和舆论环境。¹

(二) 丝路文明基本内涵

丝路文明是丝路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丝路文明，是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中华、印度、阿拉伯、希腊、波斯、奥斯曼文明等人类不同文明共同努力创造建立发展的无与伦比和独一无二的“共同文明”。

丝路文明的直接源头是，属于不同种族、信仰不同宗教、讲不同语言、具有不同肤色、穿不同衣服的丝路上的人民，在不同时间和空间里，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属于沿线不同国家的农村、商栈、城镇，教堂，清真寺里等等，进行商品交换与文化交流时，共同创造的协同（增效）作用，这种作用构成了丝路文明。

丝路文明是丝路文化的升华。丝路文化是丝路文明的基础。丝路文化是丝路上的各个文化融合、不同民族海纳百川的文化交融、交流了解彼此的灿烂果实。丝绸文明是整个古代丝路国家认可、接受和自豪的人文精神、发明创造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

¹王义伟：《“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页221，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

丝路文化是东西文明交流的桥梁。地貌多样丝绸之路造就了多元、多样、多彩的丝路文化，实现了沿线国家不同民族的友好往来，使沿线国家不同文化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促进了文明的发展。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交融的丝路文明是“金木水火土”和谐的最现实和最宝贵的典范。

总体而言，多个文明交汇融合共同形成的丝路文明是使人类共同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的集合，在时间和地域上分布的各种文明，通过共同创造人类历史上最包容性的环境，共同获得历史性和独特的“见面经验”。

（三）文明安全基本内涵

文明安全是指文明系统的完整和健康的状况，是文明发展过程当中在物理和精神方面保障不受破坏与污染等影响的程度，包括国家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宗教安全、种族安全、语言安全等基本要素。健康的文明系统特征是稳定和可持续，在时间和空间上能够维持其物理财富和精神财富，并保持对破坏的恢复力。

（四）“民心相通”与丝路地区文明安全

“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复兴丝绸之路目标的社会基础。正如习近平指出：“得到各国人民的支持和加强人民的友好往来是必须的，通过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奠定开展区域合作的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因此，“民心相通”应有“丝路特色”，应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抓手，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¹包容各种“特色”是“一带一路”最大的“特色”。“民心相通”的重要使命，就是通过增进“相互了解”、提高“互相信任”和形成“共建共识”来建立“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文明意识，建立沿线国家共同身份。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民心相通”的角色像灵魂之于身体一样关键。“民心相通”给沿线国家带来三个责任：首先是丝路国家共建“丝路意识”。沿线国家人民通过“民心相通”能够深入了解其他国家的方方面面，并发现（对方）双方和多方的共同点。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形成好感，建设友谊，加深互信。其次是丝路国家共建“丝路文化意识”。沿线国家都应该共同建立“新丝路文化”。通过借鉴古代丝路文化经验，沿线国家应共商新型丝路文化的框架和内容。通过共同组织各种各样的思考新丝路文化的平台来建立“新丝路文化意识”。最后是丝路国家共建“丝路文明意识”。丝路文明是沿线国家在共同丝路价值基础上建立的“共同文明”。从

¹李自国：“一带一路”愿景下民心相通的交融点”，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05-03）

目前的国际民族冲突、教派冲突等等问题角度来说，沿线国家共建“新丝路文明”是不可避免和历史性的任务。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经济合作越来越深入并不意味“民心相通”会自动实现。在有些非政府组织的蛊惑下，当地民众常常给外资企业制造麻烦与问题。例如：由于中越南海争端，越南国内经常爆发反华游行示威。2014年5月，越南反华示威变为暴力活动，导致中方人员伤亡和大量财产损失。¹因此，需要沿线各国特别是全亚洲国家（因为在将来会阻碍“丝路梦”的大部分威胁都隐藏在亚洲）、智库、大学、企业、非盈利组织、民众的长期不懈努力。原来“民心相通”是一项“慢工细活”，但也是“任重道远”的使命，但是在国际舞台上天天出现和不断增加的“民粹主义、民族冲突、宗教冲突、教派冲突、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威胁，严重地提醒沿线国家尽快共同采取措施消灭潜在的威胁。

为了顺利完善和实现“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使命，沿线国家都通过“丝绸之路价值”应认真地做“民心相通”工作。为了达到“民心相通”目标，上述的现实是不可忽略的事情。上述每一个层面都包含庞杂的内容，都是长期的使命。如果沿线国家能够更多共同努力推荐建立“新丝路文明”的话，这不仅有利于维护“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大型项目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也有利于对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安全。

¹委员会编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风险评估》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页119，2015.12

第三章 “一带一路”战略安全问题的应对

“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践有赖于世界秩序的稳定，世界秩序的稳定有赖于平等的联合国格局。联合国各个成员都迫切需要在世界安全上平等的话语权。人类的安全命运不可以只在 5 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手里。只有联合国每一个成员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有平等的话语权，世界秩序才能保持其稳定，新型大国才能可以给国际格局的稳定提供公共产品。如果不能成功这一核心点，世界安全将继续保持其未来的不确定性。

从 2008 年以来，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陷入经济困境证明，正在西方中心的传统国际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和转型、国际政治势力开始从西方转移到东方、西方殖民体系开始崩塌、东方开始崛起和西方开始衰落。这历史性庞大的全球趋势，是整个亚洲国家意识到和认同现实。

另外，21 世纪，迅速的高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这种新趋势相比以往，让世界各个国家对彼此依赖性变得更加深入。此外，这新科技发展强迫世界大国家肩负新的全球性责任。因此，亚洲国家相通过西方的机会主义方式一样，必须不进入区域或全球权力斗争。相反，通过建立“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新国际关系视野和外交思维模式的方式，来制定新亚洲秩序，并决定“亚洲的共同命运”。

“古代丝绸之路”在整个亚洲历史上，组成了整个亚洲人民“共同命运”的“共同价值”。从“共同价值”来说，“丝绸之路的复兴”是整个亚洲国家的“共同责任”。在实现“一带一路”战略过程当中，给“新丝路”提供真正的一个安全环境是，整个亚洲国家的“共同责任”。在东方的历史性崛起过程当中，从亚洲的“复兴丝绸之路梦想”角度来说，建设“安全新亚洲”是所有亚洲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责任”。通过借鉴古代东方智慧、三百多年西方殖民体系给学习的历史教训、21 世纪高科技时代提供的新机遇、并作为一个崛起的东方国家中国倡议“一带一路”战略提供的新视野，亚洲国家决然能够建设安全的“新丝绸之路”、“新亚洲秩序”和“新亚洲”。作为宝贵东方智慧的源泉，亚洲国家具有能够达到该目标的潜力。

第一节 “共建亚洲”共识与“一带一路”战略

中国倡议“一带一路”战略，旨在鼓励与沿线各国进行经济政策协调，进行更大

范围、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地区合作，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新地区经合作构架，符合丝路地区社会核心利益。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要把沿关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势，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来建立深刻的共同发展关系。因此，笔者认为，从国际关系角度来说，“一边倒”、“双边倒”时代已经结束，反而“多边倒”时代开始了。这就是“新丝路时代”。

在亚洲，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双轨制格局是已不是普遍的共识。相反传统的国际关系，目前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在不同领域开始建立多元关系。从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发生的新国际趋势角度来看，双轨制格局的传统共识已被打破了。例如：在东南亚中菲关系的正面趋势、在西亚土美关系的负面趋势。亚洲的东部和西部发生这两个新趋势证明是传统的共识开始变了。现有的国际关系趋势来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依存关系的程度不断深化。亚洲诸多国家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

中国提出的“共同体”模式新型亚洲关系替代了传统双轨制格局的模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往往强调“三个共同体”也证明了这新关系趋势。通过建立新型亚洲国家关系，笔者认为，亚洲一体化意识和趋势将持续下去。“一带一路”战略，可以给亚洲国家提供在安全领域上达成共识的战略机遇。因此，从建立新型亚洲国家关系角度来考量，为顺利达到“一带一路”战略的目标，亚洲国家必须先在安全领域上建立共同体。通过借鉴“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内容，亚洲国家可以打“安全共识”的基础。“安全共识”是重建亚洲共识的关键的条件。

从上述的新国际趋势角度来分析，“一带一路”对亚洲国家来说保存诸多的历史性机遇。例如：作为“一带一路”“五通”内容之一，“民心相同”是可以说最关键的机遇。“民心相同”可以给我们亚洲提供更多可以认识和了解彼此的亚洲平台。因为，我们一直强调，对亚洲国家和亚洲社会来说，最缺点就是很多亚洲人借鉴历史角度来认识和了解彼此，用历史给我们继承的问题来考量彼此之间的关系。从全球化角度来看，笔者认为，这非常对亚洲人没有什么很大的好处。因为，如果我们亚洲人继续用历史上发生的问题来考虑今天的事情的话，我们没法与时俱进。更加，“一带一路”的“民心相同”内容很难达到其目标，并“在安全、经济、政治等领域上我们肯定不能会达成共识来共同成功大事，并且这会导致我们丧失“光亮的亚洲未来”。因此，“新丝路梦”可以成为白日做梦。

从“一带一路”战略角度来分析，复兴共建“丝路”是整个亚洲国家的“共同责任”，因需要整个亚洲国家的协力作用。诸多亚洲国家正在面临着很多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信息安全”等具有全球性的特征新趋威胁势越来越加剧了。正如王义桅老师在《“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一书中强调：“中亚、非洲、东南亚地区的“中东化”危险加剧”。因全球性各种各样的新威胁增加了，为了避免安全威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从2013年9月份以来，在哈萨克斯坦第一次公布“一带一路”战略，到今天为止，每次在国际舞台上强调建立“责任共同体”。在经济、环境、文化等领域上发生新旧安全威胁，提醒和强迫亚洲国家建立与时代符合的一个“新亚洲秩序”。这因为上述全球性新的趋势给亚洲带来不可避免的现实。“一带一路”的“民心相同”是达成共识的基础。通过利用“民心相同”内容，亚洲国家可以找到共商“新亚洲秩序”和“亚洲共同安全”的平台，来达成安全共识和共建安全的“新亚洲”。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外长会议2016年4月28日在北京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凝聚共识-促进对话共创亚洲和平与繁荣的美好未来》的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和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凝聚共识，促进对话，加强协作，推动构建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共创亚洲和平与繁荣的美好未来。¹

总体分析，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亚洲各国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带一路”的最关键挑战就是“安全领域”。因此，笔者认为，亚洲国家达成“安全共识”在先，经济发展在后。因为，没有安全的一个亚洲环境里面，我们不可以讨论一个亚洲式长期稳定的共同经济发展、也完全都不可以顺利制定和实现“一带一路”战略，最后我们不可以达到“共同经济发展的目标”。必须强调的是，亚洲安全是亚洲经济发展的最大前提和保障。

第二节 建设“三个共同体”与“一带一路”战略

2013年，习近平在中亚和东南亚出访期间，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受到了沿线许多国家的快速响应，“一带一路”也瞬间成为全球热议的关键词。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内容越来越清楚，“三个共同体”概念也同时开始吸引国际舆论的注意。尤其在中国国内不仅仅在学术界上使用，也是在各种各样的行业上使用。

¹微信关注：外交小灵通，《习近平：凝聚共识，促进对话，共创亚洲和平与繁荣的美好未来》(2016-04-28)

近年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主动的外交行动应对亚太地区不断动荡的政治、经济、安全局势。中国倡议的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是最新鲜的例子。中国新外交趋势和发展来看，2013年9月，首次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走访“一带一路”多个国家，不断阐释“让共同体的意识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的发展理念，加强了与沿线国家的友好合作。因此，“三个共同体”，在顺利制定和实现“一带一路”战略过程当中，给沿线国家带来了新的外交思维模式。从国际关系角度来说，笔者认为，“三个共同体”，通过顺利制定和实现“一带一路”战略来达到共同发展的目标，在新国际关系理论和共建世界秩序上，将成为最关键概念之一。因为，“三个共同体”无论是对实现“一带一路”战略，还是将来的某个外交政策来说，具有正面的战略意义。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日上午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亚洲发展新未来》的主旨演讲。李克强总理在演讲中提出的构建亚洲“三个共同体”的重要论断。论断内容如下：

第一，坚持共同发展的大方向，结成“亚洲利益共同体”。亚洲国家要继续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把经济的互补性转化为发展的互助力，不断扩大利益交汇点。

第二，维护和平发展的大环境，打造“亚洲责任共同体”，积极探讨建立亚洲区域安全合作架构。

第三，构建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形成“亚洲命运共同体”，积极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产业深度合作、优势互补。

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目标。中国自古就有“唇齿相依”的思想。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就已深刻体会到“利益共同体”的力量。

“利益共同体”是形成“责任共同体”的基础，经济发展联动性的增强有助于各方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¹

一、建设利益共同体与“一带一路”战略

（一）利益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建立利益共同体是基础。“一带一路”贯穿欧亚非大陆，连接世界上发展势头强劲的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北美经济圈，形成纵贯东西的大经济走廊，可以使沿线各国挖掘潜力、深入合作、发挥比较优势，将经济互补性转化为发展推动力，建立世界跨度最大、最具活力、发展前景看好的，形成沿线国家经济利益对接整合的大格

局，打造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实现互利共赢。

（二）“一带一路”战略与利益共同体

人类历史以来，为争夺国际政治权力，不同国家之间发生了数不清的竞争、纠纷、冲突和战争。随着经济全球化、自动化、科技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深入发展，资本、人员、信息、技术跨国流动，国家之间相互依存，一国经济目的能否达到与别国的经济波动联系起来。一种利益纽带在各国相互依存中形成了，要实现自身利益就必须共同维护这个纽带。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等权力分配可以通过更多的非战争冲突的方式实现，各国可以通过创新平等的国际体系来保护、规范相互依存的关系，维护共同利益。

“一带一路”战略是，21世纪新型共同经济发展目标下，中国倡议得，其规模庞大超越东南亚地区涉及包括中国一共65个亚非欧国家“利益共同体”的新力量。“一带一路”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对周边外交的重视程度。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中国发展，使中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¹

从2013年9月7日至今，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辞中经常大声呼吁：“利益共同体”如下：

“我们要全面加强务实合作，将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势，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亚洲）

“新形势赋予中欧友谊和合作新的发展机遇。中欧是发展之路上的利益共同体，中国将继续从战略高度看待欧洲，支持欧洲一体化建设，相信欧洲各国人民也将同样支持中国人民走好自己所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2014年3月，对比利时进行国事访问并访问欧盟总部前夕，在比利时《晚报》发表题为《中欧友谊和合作：让生活越来越好》的署名文章（欧洲）

“中国和非洲历来是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重要基石。”

¹微信关注：微观金融，张屹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周边利益共同体》，(2015.08.11)

——2015年7月9日，在俄罗斯乌法会见南非总统祖马时指出（非洲）等等。

中国与丝路国家在进行双边或多边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过程中，以保护共同利益为重、着眼于长远利益；在发展挑战上始终兼顾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因此，中国主动倡议“一带一路”要使自身的发展更多更好地惠及沿线国家，旨在实践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和依存衍生出的一系列共同利益，已经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构建新地缘结构的坚实基础。在“一带一路”的共同发展目标下，中国提出“三个共同体”理念旨在加强新丝路的坚实基础。

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的第一要务，这种目标上的高度一致为沿线国家关系的安全发展奠定了必须的基础。在和平发展道路的愿景下的“一带一路”战略，是符合自身根本利益和时代发展潮流的。中国通过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战略促进自身的发展和沿线国家的发展，推动和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以共同发展推进更多的共同利益，加大同各国利益的交汇点，来建立“利益共同体”。

打造利益共同体是“一带一路”的基调。新丝路建设有利于打造跨越国界利益共同体，通过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等措施，深化地区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利益共同体”不仅将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主要渠道模式，还有成为未来国际区域合作的主要渠道模式。

总体上说，“共同利益”是建设“一带一路”的内生基础，构建“利益共同体”是建设“一带一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要把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合作优势，建设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必须站得高，看得远，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避免重利轻义的实用倾向，从而形成有利合作氛围和发展底蕴，为新丝路国家关系的不断发展创造合理条件。

二、建设责任共同体与“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的内涵远远超过了古代丝绸之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尤其是亚洲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所面临的安全形势是复杂的，作为准备复兴丝路的国家，沿线国家的责任比以前更重了。复兴丝路是要从亚洲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命运出发考虑的一件负有责任的大事，要以天下为己任。亚洲各国要采取一个合作、共赢、互利、包容、开放的新态度，新模式，新途径，通过“责任共同体”渠道模式，

来复兴伟大安全的“新丝路”。

(一) “责任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共建责任共同体是担当。共建“一带一路”反映了全球经济失衡环境下的中国义务担当。目前，西方国家单靠自己的力量平衡全球经济已力不从心。作为世界上最具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国家，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国际责任义务，帮助沿线国家开展规模大的基础设施建设。

新兴经济体在美国金融危机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新丝路建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维护沿线地区稳定，鼓励文化合作，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亚非欧大陆乃至世界。新丝路建设以全面创新的合作模式连接起不同文明，推进不同国家及其丝路国家人民和谐共处、相互学习，共同承担解决国际性难题的责任。不同种族、信仰、文化背景的丝路国家将在新时期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二) “一带一路”与“责任共同体”

2013年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描绘了中国与有关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蓝图，旨在复兴古代丝绸之路，本着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共建原则，促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亚非欧大陆及海洋的互联互通，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共同发展。新丝路互联互通项目将鼓励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发掘地区内市场的潜力，创造需求和就业，推进投资和消费，加深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令新丝路地区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新丝路”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上面“换挡”，更重要的是，新丝路反映在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科技、教育、卫生、创新等一系列的方面。这个“丝路”概念，前面加一个“新”，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最核心点。这个新丝路，是实现“一带一路”一个很长时间带着丝路上的人民向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新标志。“新丝路”，笔者认为，要对所有的事件，包括科技、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历史、科技都要有一个新的全球战略眼光。在今后的世界里，努力把一个利益共同体打造成命运共同体，再从命运共同体打造成“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的内涵远远超过了古代丝绸之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尤其是亚洲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所面临的安全形势是复杂的，作为准备复兴丝路的国家，沿线国家的责任比以前更重了。丝绸之路的复兴是要从亚洲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命运出发考虑的一件负有责任的大事，要以天下为己任。亚洲各国要采取一个合作、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新态度，新模式，新途径，通过“责任共同体”渠道模式，来复兴伟大安全的“新丝路”

三、建设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战略

(一) “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命运共同体”是近年来中国在不同国际舞台上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外国人士就表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复杂的形势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

建设命运共同体是升华。从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是水到渠成的理念升华。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以来，无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全面、共同、可持续安全观的提出，还是创设亚投行与丝路基金，打造中国与有关国家伙伴关系创新版，都贯穿着命运共同体意识。建设命运共同体，丝路各国必须发挥协力作用来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除此之外，还需增加除经济领域以外的合作，包括保障海陆运输通道的安全，深化新丝路地区反恐合作，构建领土与领海争端解决机制，推动海洋资源共同开发，推进环境保护领域的新合作等。

(二) “一带一路”与“命运共同体”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其他许多外交思想都容纳进去，更能反映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外交的特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周边外交、新安全观、全球秩序观、“一带一路”建设等概念，都可包涵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之中¹

自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不同国际舞台上多次阐释“人类命运共同

¹ 《中国社会科学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11.29）
http://theory.gmw.cn/2016-11/29/content_23127588.htm

体”理念，传递了中国对世界发展的美好愿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陈须隆深入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表示，“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当前外交的最高目标和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精髓所在，是对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超越，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¹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迅速实践，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尤其是被国际关系学术界也不断引起深刻的关注。从“一带一路”肩负推动人类文明创新的现实担当角度来分析，“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五通”内容、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目标，都具有高瞻远瞩、顺应时代潮流的共同点，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上，传统的国际关系思维模式改变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现，通过“责任共同体”原则，沿线国家对“命运共同体”意识能过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命运共同体”意识，能过拓展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领域，可以给丝路上的人民带来新的历史性机遇。

第三节 构建亚洲版的新安全合作

一、“亚洲版”的安全基本内涵

通过 5 千多年积累的东方政治智慧、三百多年残酷的殖民帝国历史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中心的 20 世纪国际秩序经验、高科技时代给带来的新安全意识和东方文明协力发挥的新综合智慧光亮下，基础于亚洲安全观上的安全秩序，就是亚洲版的安全。

具有亚洲特色“亚洲安全观”是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提出的，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²

亚洲安全观是对成功上述历史经验的总结，实现了理念和实践的创新与发展，是一种综合性的共同安全观。所谓“综合安全”，就是整体看待国家应对的各领域安全问题，将各种问题有机联系在一起，统筹运用国家拥有的各方面资源和手段予以综合

¹ 邓之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11-29

² 《习近平：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光明网，(2014.05.21)http://theory.gmw.cn/2014-05/22/content_11390737.htm

解决。综合安全不仅包括军事安全，也包括政治、经济、网络、信息、科技、和防灾传统和非传统等领域。

在亚洲新安全观的指导下，沿线国家必须发挥亚洲各个安全合作机制的作用，共同寻找安全机制对接的道路，实践亚洲自主安全。亚洲具有世界 2/3 的人口和世界一半的经济以及世界大部分核心自然资源，因此，需要属于己本质的安全观。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安全平台上反复强调：“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

二、亚洲新安全合作

在 21 世纪安全概念成为两种，就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随着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上的创新发展和新发明，发生了各种各样新的新安全概念用法。比如：网络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等等。

人类面临的这新的安全现实，给国际社会在安全领域上新的责任。但是，由于经济的全球化、信息的全球化、科技的全球化等新国际趋势，面临错综复杂的安全问题，各个国家单独无法承担国际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应对这新的安全趋势，亚洲国家必须协商协力解决安全问题。因此，亚洲国家能够通过“共商”原则，发展“共同安全”意识，建设“责任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来分享责任。正如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外长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凝聚共识促进对话共创亚洲和平与繁荣的美好未来》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坚持和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凝聚共识，促进对话，加强协作，推动构建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共创亚洲和平与繁荣的美好未来。¹

上述分析角度来说，在安全问题上，亚洲国家根据自己的参考，用自己的概念、组成自己的句子来创造新的适合东方文明的“安全意识”以及发展新的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感知”。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上发生的无论是传统还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上，通过亚洲特色“安全共同体”意识，亚洲国家必须进行新安全合作，协力解决共同安全问题。

在已开始构建“新亚洲秩序”过程当中，构建亚洲特色的安全秩序，这意味着，为使 21 世纪成“亚洲时代”亚洲国家必须发挥的战略作用。为了达到这目标，习主席

¹微信关注：全媒体大开讲，《亚信外长会今日北京开幕，中国如何重建亚洲新秩序？》，(2016.04.28)

提出的具有东方政治智慧特色的“亚洲安全观”、“三个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五通”内容，给亚洲国家提供历史性值得参考的战略机遇。在东方智慧和价值观基础上，建设具有东方智慧的亚洲模式“新安全合作”，将会成为“一带一路”的安全保障，以及给亚洲带来美丽的未来。

第四节 “五通”应对“一带一路”四大挑战

一、“五通”应对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是“一带一路”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恐怖主义的产生原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恐怖主义尤其是在缺乏基础设施、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能够寻找来源。“一带一路”的顺利实现将有利于扫除上述表述的产生恐怖主义的原因。恐怖主义严重威胁“一带一路”的共同发展计划。尤其在进入新投资模式时代的今天，恐怖主义不仅威胁基础设施投资，而且威胁到文化领域的投资。从各个领域来说，恐怖主义是很大一个障碍。比如随着世界不同国家发生恐怖袭击，使旅游行业受到深刻的打击，另一方面使有关国家的声誉受损。这对经济发展带来严重损害的麻烦，只有足够的政策沟通，才能解决。

“一带一路”国家的40%直接面临着恐怖主义威胁，这是完全不能忽略的数字。沿线国家在反对恐怖主义上，必须采取共同行动来消除恐怖主义威胁。为了达到这目标，“一带一路”的“政策沟通”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沿线国家通过“政策沟通”必须加强反恐合作、丰富反恐合作内容、共同创造创新增加奋斗方式。因此，沿线国家通过“共商”方式，可以共建专门的、新的一个“丝路反恐机制”来共同维护丝路上的共同发展项目。随着该专门反恐机制的共建，沿线国家可以提升共同反恐能力。“丝路反恐机制”（Silk Road Anti-Terror Mechanism）在“一带一路”项目在建设构成当中，可以提供安全服务来维护项目和人员安全。

恐怖主义的最重要吸纳新成员地区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区域。在恐怖主义潜在密集的地区，通过准确地实践“一带一路”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内容，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将有助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对落后地区当地人民直接带来好处的投资项目，将严重打击恐怖主义发展，同时，会减少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趋势，“三股势力”的活动空间会被大幅压缩。因此，在反恐路上，“一带一路”的“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的作用必须积极地发挥。

“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内容上的投资，滋生恐怖主义的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种族冲突、教派冲突等的因素，将被大幅消灭。除了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外，还有低水平的教育问题。“民心相通”在教育领域上，必须投大量的资金来提高当地人民的反恐意识水平。“民心相通”是最必要的精神投资。因此，在实践“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项目中，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按照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当地人民的真正要求，共同筹划准确的项目。随着“民心相通”投资增加，恐怖主义将被受到严重打击。

二、“五通”应对宗教冲突

大规模的宗教冲突可能性不仅会影响“一带一路”下的项目，而且还会对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政治安全格局产生影响。宗教冲突对亚洲地区的整个经济、文化等投资项目存在很大的威胁。可能的一个教派冲突能够成为除了影响亚洲以外包括欧洲、非洲甚至美国在内的全球不稳定的原因。尤其可以想象，从亚洲和非洲的宗教和教派角度来说，发生这样的大事件是非常可怕的。

从宗教历史看，例如基督教历史上，在 17 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不同教派间发生了冲突。又如伊斯兰教历史上，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去世之后，在穆斯林集团内部发生了小规模冲突。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发生冲突的原因都是政治和宗教分歧导致冲突。经济原因没有直接影响教派冲突。但是，教派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一直是潜在的能够导致冲突的风险。

目前来看，中东地区面临着自古以来最大的程度的教派冲突威胁。在叙利亚内战的动荡环境里诞生的 ISIS 开始滥用伊斯兰教的逊尼派身份。一边用伊斯兰教身份，另一边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开始给当地穆斯林带来社会压力，进行恐怖活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从历史以来是一直生活在一起的。但是，ISIS 的崛起给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教派冲突可能性。实际上，恐怖主义本身就反伊斯兰的，与伊斯兰教义背道而驰¹。有些大国通过滥用伊斯兰教名义建设恐怖组织，来进行起地缘战略目的。ISIS 也是同样方式以地缘战略利益意图被有些大国支持。故意用“逊尼派”名义以奠定教派冲突的基础。

教派冲突是阻止“一带一路”投资的最大潜在威胁之一。“一带一路”沿线诸国

¹微信关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马雪峰：伊斯兰教义中没有任何容忍恐怖主义的地方》，2015-11-17

具有不同信仰和教派。比如，“一带一路”上国家的宗教教派格局是错综复杂的。从中国开始一直延伸到土耳其的这条路线上，如果发生一个规模大的宗教教派冲突，将会导致整个沿线国家的稳定的破坏。因此，为了避免未来可能的宗教教派冲突，沿线国家通过“一带一路”的“政策沟通”方式，在“共商”原则基础上，必须采取共同战略措施。

保存不同信仰、思潮、教派等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宗教方面彼此之间有着多维度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比如：中国的穆斯林社会与其他国家穆斯林间的关系。另外一个例子，马来西亚的信仰佛教的群体与其他国家信佛的群体间的关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具有类似的实际情况。因此，为了使沿线国家的多样性成为真正的新丝路文明价值，而不是化为“文明冲突”，在“政策沟通”的帮助下，在丝路宗教意识责任、新丝路外交文化意识以及“共建”原则意识基础下，沿线国家必须建设一个“丝路宗教合作机制”（Silk Road Religion Cooperation Mechanism），以共同减少宗教冲突风险来维护丝路宗教安全。

从经济角度来说，通过增多加强“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合作以及丰富互联互通的内涵，能够给丝路上不同的信仰组织提供一个新的融合机会。随着“贸易畅通”下的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的深化，丝路上信仰不同的商人将会增加互相交流和互动。这新丝路的动态环境将给丝路民族提供更多的互相认识和了解的机会。成功实现这一目标，将服务于“一带一路”达到“开放包容”的“命运共同体”愿景。

建设“丝路宗教合作机制”，在“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框架下，能够给丝路国家提供可以“共商”丝路宗教的方方面面，共求宗教有关问题的解决方法。在新丝路上，通过建设“开放包容”的“民心相通”环境，能够给不同的宗教教派、思潮等互相认识和了解机会，提升不同宗教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水平，奠定新丝路和新思路的“命运共同体”基础。

在实践“一带一路”的“五通”过程当中，深入正确以及按照实际情况考量丝路地区的信仰多样性，将有利于消灭“文明冲突”和“宗教冲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和平和文明崛起，将给“开放包容”的“新丝路文明建设”提供重大的贡献。这将成为东方给人类的和平发展提供的历史性贡献。

三、“五通”应对民族冲突

没有任何一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由单一种族形成的社会结构。尤其是，

亚洲地区各国的民族格局具有错综复杂的跨境特征。每个沿线国家有由许多不同种族组成的社会结构。各个种族拥有跨境种族关系的特征。比如：中国西部地区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哈萨克种族与哈萨克斯坦具有跨境关系、伊朗北部地区阿塞拜疆人与阿塞拜疆国家具有跨境关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个种族都具有类似的跨境关系。因此，可能发生的民族冲突是威胁“一带一路”的最大障碍之一。

民族冲突有政治、经济、历史恩怨等不同的物质和精神原因。从“政策沟通”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样种族格局具有非常敏感的社会性质。同时，这敏感的社会格局对沿线地区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为了避免具有跨境性的民族冲突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策沟通”新的对话和合作模式的帮助下，在丝路种族意识责任、“新丝路外交文化”意识以及“共建”原则意识基础下，沿线国家必须“共建”一个“丝路民族合作机制”（Silk Road Nations Cooperation Mechanism），以共同取消民族冲突风险来维护丝路民族安全。随着“共建”该机制，丝路国家能够加强在解决种族有关问题方面的合作。

从经济角度来说，通过增多加强“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合作以及丰富互联互通的内涵，能够给丝路上不同的民族提供一个新的融合机会。随着“贸易畅通”下的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的深化，丝路上属于不同种族组织的商人将会增加互相交流和互动。这样新丝路的动态环境将给丝路民族提供更多的互相认识和了解的机会。实现这一目标，将有利于“一带一路”达到“开放包容”的“命运共同体”目标。

在实践“一带一路”的“五通”过程当中，深入正确以及按照实际情况考量丝路地区的种族多样性，将有利于消灭“文明冲突”和“民族冲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样和平和文明崛起，将给“开放包容”的“新丝路文明建设”提供重大的贡献。这将成为东方给人类文明的和平发展提供的历史性贡献。

四、“五通”应对大国干预

“一带一路”面临最大的障碍是大国干预。世界最大的干预者是美国。目前来看，美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不同的领域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从目前的国际关系角度来说，对一个国家或者区域的政策进行直接干预已是很难的。经济的全球化和技术的快速发展令国际关系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因为，用直接干预方式马上会导致“溢出效应”。比如：直接开战。这方法造成的效应也可能溢出到干预者国家。由此可见，在21世纪用“直接干预方式”能够给带来不可想象

的结果，令干预者国家付出大量的战略代价。美国已认识到这一重要战略观念。因此，一般情况大国会选择“间接干预方式”。因为这方式的成本低而其造成效应是很大的。比如：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已成为美国的最普遍的间接干预战略手段。ISIS 的崛起，叙利亚内战时有些恐怖组织用美国国旗侵略土地是最新的证明。

从政治角度来说，为了顺利实践“一带一路”项目以及惠及丝路地区的发展，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域外大国干预都必须被阻止。显而易见，从当今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角度来评估，单靠一个或者两个国家是无法应对“一带一路”面临的大国挑战，沿线国家共同努力发挥协力作用，携手合作将有助于大国干预问题的解决。“政策沟通”是给沿线国家提供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共商”平台。沿线国家能够采取共同政策措施。在“政策沟通”的帮助下，在丝路政治安全意识和责任、新丝路外交文化意识以及“共建”原则意识基础下，沿线国家必须建设一个“丝路共同安全共商机制”(Silk Road Common Security Advisory Mechanism) 以共同减少政治安全风险来维护丝路政治安全。

“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互利共赢”的共同发展。应对共同发展面临的挑战是沿线各国的共同使命。因此，沿线国家为了避免很有可能的域外干预，为了迅速应对大国间接干预带来的障碍，必须采取共同应对政策。为了避免这些隐患，通过“丝路共同安全共商机制”沿线国家间的“政策沟通”被深化加强，积极发挥“政策沟通”的作用。随着“政策沟通”的深化，沿线国家间的互相认识和了解将会增加，将服务于巩固和提升沿线国家间的政治互信。沿线国家间足够的政治互信，将帮助于容易达成共识应对大国干预挑战，采取共同应对措施。这将帮助“一带一路”的顺利实践，实现共同发展目标，打造“命运共同体”。

从经济角度来说，通过加快“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合作以及丰富互联互通的内涵，能够减少沿线国家受到西方大国的经济金融压力，增加沿线国家需要的资金来源。作为旨在共同发展的“一带一路”，通过给沿线国家带来新的经济发展机会，将给沿线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提供能获得新的视野，将给沿线国家提供能提升自己发展能力的新经济平台。这些新机会，将给沿线国家提供能解放对单方面的经济依赖性以及赢得自己的经济独立的机会。随着“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的加快，沿线国家能够阻止西方大国的经济金融干预。这将服务于“一带一路”的顺利实践，实现共同发展目标，打造命运共同体。

众所周知，西方大国为了影响目的国家的有些外交政策，通过利用宗教、教育、

文化等领域的有些非盈利组织，进行间接干预，鼓动非盈利组织进行抗议。在建设过程当中“一带一路”项目已经遭遇了抗议攻势。比如：在越南、阿富汗等，有些非盈利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议。以西方为主的非政府组织的宣传策略十分高明，以学生、青年等为目标群体，以道义、人权为切入口，对其宣传西方理念，利用当地群众思想的不成熟之处，从而达到自己的间接达到目的。通过利用亲西方的智库、媒体，炒作传播舆论，在这些国家达到混淆视听的效果。比如：“文明冲突”、“中国威胁论”等。类似很多的例子都是西方大国的间接干预方法。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民心相通”的帮助下，必须共同安排精神方面对“一带一路”有好处的活动。比如：在教育、文化、宗教等领域加快“民心相通”合作。在建设新丝路文明路上，“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的社会基础。因此，沿线国家应该充分发挥“民心相通”的宝贵作用。随着加深沿线国家间的“民心相通”合作，上述西方大国的间接干预不会达到其阻扰目的。为了避免上述西方大国的间接干预的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民心相通”新的对话和合作模式的帮助下，在丝路“命运共同体”意识、“新丝路外交文化”意识以及“共建”原则意识基础下，沿线国家必须“共建”一个“丝路文明传播机制”(Silk Road Civilization Propaganda Mechanism)，以共同抵抗西方大国的炒作威胁来维护丝路投资安全。随着“共建”该机制，丝路国家能够加强在解决和避免以西方为主的非政府组织造成的炒作方面的合作。

在顺利实践“一带一路”的“五通”过程当中，审慎准确地以及按照实际情况考量丝路地区面临的西方大国干预，将有利于对抗西方大国的干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样和平和文明崛起，将给“开放包容”的“新丝路文明建设”提供重大的贡献。这将成为东方给人类文明的和平发展提供的历史性贡献。

结 语

本文立足于“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安全问题，利用了文献阅读、历史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深入分析“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恐怖主义、宗教冲突、民族冲突、西方干涉等“安全（传统和非传统）挑战”。立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安全利益与共识，其中包括“三共五通”，“三共”是指共商、共建、共享，“五通”是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共建亚洲、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以及新亚洲安全观的应对策略，从而实现亚洲安全共同体的目标，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奠定安全基础。



附录

国外对“一带一路”与安全问题看法的采访

笔者：从安全问题角度来看，您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共同发展战略怎么评价？

H.K Jain (印度驻缅甸公使)：中国在南亚的经济投资越来越多，比如中国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建设。我觉得中国在瓜达尔港的投资背后蕴含着军事意图。通过这些投资和建设大型项目，中国想要增加其在印度洋的影响力。因此，我认为中国将来会把瓜达尔港用于军事目的。(印度驻缅甸大使馆，仰光，缅甸，2016年2月2日)

Myint Kyaw (缅甸地方政府官员)：(一带一路)“共同发展”战略是对中缅双方而言有利的。我希望新丝绸之路的复兴可以带动区域的发展，造福包括缅甸在内的东南亚区域国家人民。(仰光市政府城市发展部，仰光，缅甸，2016年2月3日)

Ehsanul Haque (孟加拉国大学教授)：(一带一路)共同经济发展是对沿线国家有意义的。但是，我们需要看到，亚洲很多地方面临着安全问题。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必须更多地主动地承担国际责任。(达卡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达卡，孟加拉国，2016年2月9日)

Mohammad Tanzimuddin Khan (孟加拉国大学副教授)：“共同的经济发展”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期待的一个现实。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去承担在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安全问题上更多的责任。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声音很难听到，中国似乎总是对一些重大问题、事件表示沉默。(达卡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达卡，孟加拉国，2016年2月9日)

Neetesh Saxena (印度国家文化部考古专家)：丝绸之路讲述了2000年的亚洲故事。今天，复兴丝绸之路是一个伟大的计划，是亚洲各国都必须承担责任的大事。(鹿野苑，瓦拉纳西，印度，2016年2月14日)

G.N. Khaki (印度大学教授)：我们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感兴趣。然而，从安全角度考量，中国和印度有悬而未决的边境的问题。不过，我们也有复兴丝绸之路的期待。我认为复兴丝

绸之路对整个丝路区域有历史性的意义。（克什米尔大学中亚研究中心，斯利那加，印度，2016年2月25日）

Ravinder Jit Kaur（印度大学教授）：经济发展对我们这个区域来说是最主要的需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共同发展”战略对区域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克什米尔地区有许多安全问题，在许多方面各方都未能达成共识，例如中国印度边境问题尚未解决。共同经济发展与否，将取决于地区安全问题是否达成共识。（克什米尔大学中亚研究中心，斯那里加，印度，2016年2月25日）

Suhail Bukhari（印度媒体记者）：我觉得经济发展需要一个真正的安全环境。中印在边境问题上还未达成共识，但是“一带一路”是长期性的大事，所以，相关国家需要在安全方面达成共识。（斯利那加，印度，2016年2月26日）

Can Ziplar（土耳其在华商会首席代表）：对中土关系而言，“一带一路”战略给双方带来巨大的经济发展利益。两个国家在很多领域上有共同合作的潜力。在中东和非洲，中土企业可以共同投资，中国企业可以利用土耳其在中东和非洲的软实力，在第三国家建筑行业上两国更多地去合作而不是竞争。如果亚洲安全问题解决的话，土耳其可以成为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跳板。（土耳其工商业协会驻北京代表处，北京，中国，2016年3月16日）

Mustafa Ilker Ozdem（土耳其驻华大使馆经贸参赞）：“一带一路”是规模庞大的计划，对中土经济合作而言存在很多的机遇。中国在土耳其的高铁项目是中土经济合作成功的范例。从安全角度而言，两国在很多领域有合作的空间。（土耳其驻华大使馆，北京，中国，2016年3月18日）

Bengu Yigitguden（土耳其驻华公使）：土耳其也有复兴丝绸之路的计划——“中间经济走廊”计划。去年，在安塔利亚举办的G20峰会上，中土签订了“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对两国关系而言，“一带一路”在经济、文化等领域上存在合作的空间。在“一带一路”的具体实践过程当中，两个国家有很多合作潜力。从安全角度分析，经济发展问题若越不去解决，安全问题将越严峻。从应对国际恐怖主义领域来说，两个国家可以共同协力反恐，必须更多地发挥现有的安全机制的作用。（土耳其驻华大使馆，北京，中国，2016年6月22日）



参考文献

著作类：

- [1] 冯并著：《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 版
- [2] 赵磊：《一带一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中信出版社，2015 版
- [3] 毛振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报告》，经济日报出版社，2015 版
- [4] 卓新平，蒋坚永：《“一带一路”战略与宗教对外交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版
- [5] 任宣：《图说一带一路大战略》，人民日报出版社发行部，2015 年版
- [6] 文治：《改变世界经济地理的一带一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 [7] 王义枢：《“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机遇与风险》，人民出版社二科，2015 年版
- [8] 张洁：《2015-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一带一路与周边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版
- [9] 王胜三：《一带一路列国志》，人民出版社二科，2015 年版
- [10] 秦玉才：《一带一路一百问》，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 [11] 秦玉才：《一带一路读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 [12] 李永全：《丝路列国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版
- [13] 毛振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报告》，经济日报出版社，2015 年版
- [14] 王胜三，陈德正：《一带一路列国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
- [15] 邹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
- [16] 王灵桂：《海丝列国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版
- [17] 郑贵斌：《山东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二科，2015 年版
- [18] 谢和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纵览》，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
- [19] 杨善民：《“一带一路”环球行动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版
- [20] 新玉言，李克：《崛起大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全剖析》，台海出版社，2015 年版

论文类：

- [1] China's Grand Strategy: The New Silk Road，中国的宏伟战略：新丝绸之路，赫芬顿邮报，2015
- [2] China's Rise to Global Economy Superpower, 中国崛起成为全球超级经济大国，赫芬顿邮报，2015
- [3] Year of the Sheep, Century of the Dragon?，羊年，龙的世纪？，赫芬顿邮报，2015

- [4] The New Silk Road: A True “Win-Win” or a Perilous Future?, 新丝绸之路：“合作共赢”还是危险重重？, 赫芬顿邮报, 2015
- [5] China's trump card in economic diplomacy, 中国的经济外交王牌, 海峡时报, 2015
- [6] China: With friends like these, 中国有朋如斯, 金融时报, 2015
- [7] Stakes in Prosperity: China's Belt and Road projects can emerge as a bulwark against extremism in South Asia, 繁荣的支柱：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将成为瓦解南亚极端主义壁垒, 印度时报, 2015
- [8] China Follows Silk Road in Search for Land of Fast Growth, 中国借助丝绸之路谋求快速发展, 华盛顿邮报, 2015
- [9] New Silk Road Ruins US Military Plans to Impose Blockade of China, 新丝绸之路毁灭了美国封锁中国的军事计划, 俄罗斯卫星网, 2015
- [10] Charm Offensive: China Engaging Europe in Silk Road Project, 炫目的攻势：中国让欧洲加入丝绸之路项目, 俄罗斯卫星网, 2015
- [11] Maritime silk road should keep disputes in perspective: Former foreign minister George Yeo, 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应该正确看待海上丝绸之路, 新加坡海峡时报, 2015
- [12] Silk Road to Link Asia to Europe, Strengthen Continental Powers, 丝路连接欧亚, 强化大陆力量, 俄罗斯卫星网, 2015
- [13] The unstrung pearl in Sino-Indian relations, 中印关系间一串散落的珍珠, 印度时报, 2015
- [14] 郑永年: 《丝绸之路与全球经济再平衡》,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2015
- [15] 王义桅: 《论“一带一路”的历史超越与传承》,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2015
- [16] 赵可金: 《“一带一路”核心区的发展不能指望优惠政策》,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2015
- [17] 倪稼民: 《基于文化共通与文化多元视角解读“一带一路”》,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2015
- [18] 方鹿敏: 《“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之罗马尼亚》,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2015
- [19] 陈琮与渊, 敖梦玲: 《缅甸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2015
- [20] 魏德东: 《宗教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民族报, 2015
- [21] 萧霁虹: 《云南佛教文化交流与“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民族报, 2015
- [22] 翁涛: 《土耳其、“欧亚主义”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盘古智库, 2015

- [23] 梁海明: 《“一带一路”下如何寻求文化共生, 盘古智库》, 2015
- [24] 王志远: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背景、空间延伸与战略内涵》, 吉林大学《东北亚论坛》, 2015
- [25] 舒先林: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能源外交》, 《国际展望》第五期, 2015
- [26] 张卫婷: 《中国在土耳其推进“一带一路”风险预估及对策》, 中东研究通讯, 2015
- [27] 任国刚: 《TPP与“一带一路”, 是中美两国全球新战略博弈》, 海外利益研究, 2015
- [28] 钟飞腾: 《“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全球发展解决方案, 中国青年网》, 2015
- [29] 薛力: 《周边国家如何看待“一带一路”》, 东南亚问题研究, 2015
- [30] Dr. Dmitry Savkin: 《俄罗斯和中国在欧亚一体化“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共同体”之间的合作前景》, 一带一路研究院, 2015
- [30] Dr. Esme Ozdasli: 《中国的新丝路项目与其全球性影响》, Mehmet Akif Ersoy University, Turkey, 2015

致 谢

蓦然回首，白驹过隙，三年在深大的日子画上了一个句号。

研究生攻读期间，首先感谢我的导师徐建华副教授对我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大到知识体系的建立及学术能力的训练，小到论文选题至论文完成的各个方面，都为我的前进方向点上一盏明灯。徐老师严谨治学的精神，为人处世的态度等等都是我努力学习的榜样。在此，对徐老师在学术上和生活上对我的悉心指导和帮助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在硕士攻读期间，还谢谢姜安老师、章一平老师、项锷老师、娄亚萍老师、杜婷老师、张定淮老师、唐娟老师、劳婕老师不仅给我专业知识上的补充，更是在思想及品德上给我教育，让我在踏入社会前做好准备. 这些的教导，将是我以后工作、学习、生活中受益终身的财富。

从 2013 年踏进荔园，终于到说再见的时候，这些年一步步心怀学术，静水流深，心中不舍。但愿荔园不老，天风海涛。